

温州史志

WENZHOU SHIZHI

存史
资政
育人

2020年第1期
(总第130期)

■ 专题

03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陈伟俊专题听取史志工作汇报

■ 红十三军成立90周年专题

05血染的丰碑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成立90周年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论红十三军斗争的历史启示 12

12 ◇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理论学习中心组

红十三军精神永放光彩 18

18 ◇ 永嘉县中共党史学会 永嘉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18 永嘉县红十三军历史研究会

探析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 22

历史底蕴及现实意义 22

22 ◇ 陈敏

1938年霍乱大爆发 温州各界协力防疫 31

31 ◇ 王长明

解放初期泰顺的三次麻疹大流行 36

36 ◇ 陈蔡玉

温州现代工业体系建设历程 41

——新中国建立初至“文革”前 41

41 ◇ 张声和

温州市鹿城城市信用社成立的 48

背景、过程与影响 48

48 ◇ 陈建敏

目录 contents

- 浙闽边区女性对红军挺进师革命 55
活动的支持 55
55 ◇ 谭桂涛 夏艺洵
记录温州金融历史 谱写改革开放华章 60
——《温州金融志（1978—2015）》编纂经验谈
60
60 ◇ 陈明衡
“小小”故事映初心（主题） 67
◇ 李 艺 67
不忘初心的老革命——宋廷铭 77
77 ◇ 昆仑岩
浙南几位英烈的红色家书 81
81 ◇ 郑昌儒
橘井留香 89
89 ◇ 施菲菲
“永嘉前辈读书多”名联的来历 94
——孙锵鸣与会文书院 94
94 ◇ 陈盛奖

插 页：七十华诞 温州蝶变
封 二：图片报道
封 三：曾唯《雁荡山志》山总选录 章方松（书）
封底篆刻 蓝 潮



2020年第1期
(总第130期)

主办单位：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温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温州史志》编委会：

主 任：王文胜
副主任：赵万磊 魏仕阔
张声和 张致光
委 员：张 林 张林洁
毛少甫 郭东升
周婷婷 厉 靖
陈 好

主 编：王文胜
执行主编：赵万磊
副主编：张 林 陈 静
校 对：杨建明

地 址：温州市行政中心一号楼
电 话：88969623
传 真：88968777

Email: chenj@zjds.org.cn

邮政编码：325009

出版日期：2020年3月

刊 号：浙内准字第C044号

印 刷：温州市北大方印务有限公司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陈伟俊 专题听取史志工作汇报

3月30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陈伟俊专题听取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志办）的工作汇报，并对下阶段史志工作提出要求。

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志办）主任王文胜就前阶段史志工作和今后一段时期工作思路和计划作了全面汇报。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志办）将进一步担负起历史记录者的责任，及时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史料收集和编研工作，在疫情防控中积极发挥职能作用；进一步讲好党的历史故事，建好平台、守住阵地，积极做好红十三军成立9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重大纪念活动，编辑《温州百年百事》《温州百年大事记》，出版《浙南百名英烈传》，把党史地方志的编研成果更好地转化为资政育人实效；进一步推动编研工作，打好扎实基础，全面做好党史三卷、市志、年鉴、雁荡山专志等工作，

争取在编研能力、质量和水平上有新的提升；进一步围绕中心工作搞好服务，做好温州民营经济、温州改革开放方面口述历史的记录，为市委市政府提供决策参考；进一步做好红色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工作，更好地挖掘红色资源，助推乡村振兴；进一步履行好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主动发声，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陈伟俊书记高度肯定温州市史志工作特别是在2019年纪念“省一大”召开80周年活动和助力温州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的表现，高度肯定史志干部队伍有思考、有担当、有创新，能够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对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志办）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党史地方志工作计划，陈伟俊书记予以明确肯定并作出重要指示。

一要切实加强新时代条件下的党史

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不愧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把党的历史故事讲好、让党的历史故事能深入人心，是各级党委光荣的历史使命。党史部门的作用不可替代，要加强对做好党史工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切实担负起资政育人的政治责任，进一步增强党史工作成果的系统性，拓展工作深度，展现新时代党史工作的新作为。

二要为庆祝建党100周年做好充分准备。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对于开展向建党100周年献礼的工作，市委高度重视，史志部门要提前谋划、早做打算，做好充分准备，确保庆祝活动有声、有形、有足迹。

三要对红色资源进行挖掘和整理，形成系统方案。温州是一块红色土地，红色资源很丰富，要很好地整理、归类，护好用好红色资源，提升红色文化的影响力，使红色资源能够拿得出、叫得响。

四是党史地方志工作要有创新、有创造。要不断拓展党史地方志工作的阵地和途径，发出更多声音，并且同群众的获得感结合起来，让史志资源变资产、无形变有形，促进文旅结合、红绿融合，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

陈伟俊书记同时对史志干部提出殷切期望，勉励大家多读书思考，上好党员干部修身养性的必修课，进一步提高思想境界，不负韶华、激情干事，为续写好温州创新史贡献史志力量。

血染的丰碑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成立90周年

◇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1927年，国民党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中国共产党自此开始独立高举革命旗帜，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领导中国人民开展土地革命。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中，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简称红十三军）于1930年5月在永嘉成立。红十三军是我党在浙南农民武装暴动基础上创建并领导的一支农民革命武装，是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编入正式序列的全国14支红军之一。英勇的红十三军，在浙南浴血奋战、不畏生死，是这片热土上耸立的一座血染的丰碑。

一、播火瓯江两岸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会议

精神，恢复和发展党组织，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斗争。

1928年1月初，中共浙江省委特派员郑馨到温州，找到了分散在各地坚持斗争的骨干。下旬，郑馨召集永嘉、瑞安、平阳等县党的骨干开会，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决定恢复与整顿党的组织，领导农民开展斗争，准备武装暴动。会后，永嘉平3县先后建立了县委。郑馨在温州恢复与整顿党组织的同时，开始酝酿武装暴动。

3月，省委派林平海、王屏周到温州，加紧暴动的准备工作。他们召集永嘉平3县党的负责人及有关人员开会，商讨联合暴动计划。6月27日，3县农民联合武装暴动举行。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参加暴动的农民撤回农村，以不同的方式，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作斗争。

1929年，浙南地区自然灾害频仍，

风虫为虐，水旱并至，粮价飞涨，民不聊生。不少地方出现了“村村饿殍相枕藉，十家九室断炊烟”的惨景，而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有增无减，农民生活陷于绝境。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中共永嘉中心县委根据中央指示，广泛发动群众，领导贫苦农民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闹荒和反对土地陈报、村里制斗争。斗争引起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恐慌，国民党反动派派兵镇压，导致武装冲突。

是年11月14日，永嘉西楠溪爆发了84个自然村4000多农民参加的武装大暴动。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浙江省保安队前往镇压。永嘉中心县委决定因势利导，发展游击队，公开组织红军。并派中心县委委员雷高升、李振声赶赴西内（今碧莲、四川一带），加强对农民暴动队伍的领导。

自1929年至1930年初，中共浙南各级党组织多次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建立农民武装队伍。浙南农民的武装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封建势力，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为红十三军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建军永嘉勉园

浙南地区风起云涌的农民暴动，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1930年1月，党中

央派巡视员金贯真到温州、台州巡视。2月初，金贯真主持召开永嘉中心县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研究党组织的整顿和发展工作。会议议定以永嘉、瑞安、平阳游击战争中心区域的斗争，推动和援助其他各区的斗争，造成温属各县的总暴动。28日，金贯真向党中央写了关于温、台地区政治形势、群众斗争等的详细报告，还向在上海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建议，派胡公冕到浙南负责军事指挥。

3月初，中央军委派胡公冕回到家乡永嘉，同来的有刘蜚雄、金国祥等军事干部。胡公冕等人抵达后，集中了雷高升、胡协和、谢文侯3支武装。9日，胡公冕率队伍到达永嘉县黄皮，在黄皮寺成立“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胡公冕任总指挥，刘蜚雄任参谋长，金国祥负责经济工作，王国桢、李振声负责政治工作。红军游击队共计400余人，编为3个支队。不久，中央军委又派陈文杰（柴水香）到浙南。他以永嘉县莲花心村（今属瓯海）为中心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

3月下旬，金贯真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浙南武装斗争情况。31日，党中央致信浙南党组织，指出：浙南党的策略路线就是“坚决在浙南以永嘉、台州为中心，组织地方暴动，建立红军”。4月

3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以后各地已组织的正式红军，一切指挥权完全统一于中央军委”，“地方的赤卫队游击队及一切地方性的武装，均应渐次集中组织为红军”。

为贯彻中央指示，金贯真回到浙南，于4月中旬主持召开永嘉中心县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决定：“温州游击队暂编为浙南红军第一独立团，台州游击队暂编为浙南红军第二独立团，永康游击队暂编为浙南红军第三独立团。”同时加强地方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26日，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报道：“在英勇的斗争中，红军组织之猛进，更是一日万里之势。目前已成立的共十四军”，浙南为“第十三军”。

5月初，西楠溪红军游击队攻下永嘉县枫林镇后，平阳、瑞安、仙居等县的一部分游击队也相继集中到此整训。整训期间，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根据中央指示，在“勉园”宣布浙南红军游击队统一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正式成立军部，军长胡公冕、政委金贯真、政治部主任陈文杰，军部设在永嘉县五尺村。军部建立后，以各地游击武装为基础，先后建立了3个团。

红一团与红十三军军部同时成立，最初由永嘉西楠溪30多支红军游击队整编而成，团长雷高升，政委金国祥。下

辖3个大队，大队长分别由雷高升、胡协和、谢文侯担任。不久，瑞安北区游击队500多人，黄岩、仙居游击队各200多人，青田和缙云两地的部分游击队200多人也编入红一团。红一团共计3200多人，是红十三军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团。

红二团是以台州地区的温岭坞根游击队为基础于7月组建而成的，团长柳苦民，政委赵胜（杨敬燮）。指挥部设在坞根洋呈村，全团约1200人。

红三团由永康、缙云、仙居的红军游击队共1500多人于7月整编而成，程仁谟（后叛变）任团长，楼其团任政委。全团有各式枪支900多支、土炮4门、手提机枪4挺，是红十三军武器最精良的一个团。

红十三军建立后确定的发展方针是：向有群众组织的地方发展，一面配合区县暴动，一面实行红军政纲，实行土地革命，由此充实和改造红军。5月23日，中央军委发来指示，要求红十三军开展军事训练，施行坚决进攻，向中心城市交通区域发展。并指出，“中央决定你们成立第十三军的基础，将现有的三团扩充为三师的前途”。因此，红十三军下属的3个团，在以后的活动中也曾同时使用过“师”的番号。

三、攻打中心城镇

红十三军建立后，在中央提出的“赤化浙江”思想指导下，把攻打中心城镇作为主要的军事行动目标。

攻打平阳县城

5月15日，胡公冕、雷高升率领900多人从永嘉表山（红十三军后方基地）出发，途经青田平桥时，击溃国民党省保安队两个连。进入瑞安县境后，袭击了陶山镇警察所，夺取了全部武器。23日晚，红一团和瑞安农民赤卫队700多人会合，进入平阳县境。平阳县委负责人吴信直及叶廷鹏分别率江南、万全赤卫队共600多人前来接应。24日上午9时，红一团在平阳、瑞安农民赤卫队1000多人的配合下，攻入平阳县城，缴获了部分枪械，占领了县政府，并打开监狱释放了被关押的群众。后遭国民党守军疯狂反扑，红一团浴血奋战到下午3时撤出战斗。平阳之战，红一团和赤卫队员共牺牲192人。当时的《上海报》和苏联《真理报》皆予以报道。

攻打平阳之前，金贯真到平阳部署战斗及做国民党军策反工作，在5月20日返程途中，于温州城内被捕，当晚牺牲。胡公冕在攻打平阳后，鉴于斗争形势和干部奇缺的情况，去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工作，军部交由陈文杰负责。

隘门岭事件

6月25日，红一团及农民武装600多人在中队长徐定魁率领下，与一支黄岩农民武装会合，准备夺取海门（今台州椒江）国民党驻军的枪械，在温岭塘岭附近遇国民党军拦截，战斗不利，决定返回永嘉。27日，部队途经乐清大荆隘门岭时，遭到大荆反动民团的伏击。红军和农民武装除少数突围外，大部分在战斗中牺牲或被俘。大荆民团头目蒋叔南在大荆小山头设立“公堂”，从28日起连续3天，对被捕红军和穷苦农民经简单审讯后即开枪杀或剖腹、剜心、砍头、剁脚等手段残杀。然后雇人将尸体抬往百岗岭船山合理，人称“千人坑”。血战隘门岭是红十三军众多战斗中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共计471人。

攻打缙云县城

8月下旬，红一团决定向西攻打缙云县城。为迷惑国民党缙云守军，红军扬言再攻处州（今丽水）。31日拂晓，陈文杰和雷高升率900余人到达缙云城南郊。在当地赤卫队的配合下，红军攻克缙云县城，缴获一批枪支、弹药。红军占领县城后，打开监狱释放200多“犯人”（其中不少是地下党员和红军战士），并将没收的盐、布匹、铜元分给穷人。但由于周边大批敌人分几路向缙云逼近，红军考虑守城不利，3天后主

动撤离。攻克缙云县城，是红十三军百余次战斗中最成功的一次。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专门作了报道：“八月三十一日温州红军一千余攻入缙云县城……九月三日自动退出县城。”

袭击永嘉瓯渠

9月9日，红一团又乘胜袭击永嘉瓯渠。瓯渠距温州城30公里，驻有省保安队1个连和地主武装，并筑有碉堡。国民党守军慑于红军攻克缙云的声威，不战而逃。红军兵不血刃占领瓯渠，没收了地主豪绅的大量浮财，然后退回永嘉表山。瓯渠大捷极大地震慑了敌人，永嘉城内国民党当局极度恐慌。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专题报道：“游击队入村，全无抵抗。”

红军离开瓯渠后，国民党军疯狂报复，杀害100多名当地群众。陈文杰在攻打瓯渠时受了重伤，就近养病，被叛徒出卖遭捕，于9月21日在温州牺牲。金贯真和陈文杰的相继牺牲，严重削弱了红十三军的领导。

在红一团攻打中心城镇的同时，红二团也在温岭、玉环、乐清、天台等县的边境进行大小30多次战斗。红三团则分散活动在永康、缙云、仙居交界地区。

四、血洒东宗祠堂

红十三军武装斗争的扩大和浙南

党组织的发展，严重威胁着国民党的统治。国民党派重兵“清剿”红军，同时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面对国民党优势兵力的“清剿”，红十三军军部决定分散游击。军长胡公冕和军部几位外来干部杨波等也先后转移到上海。至此，由于主要领导人先后牺牲或离去，军部实际上已不存在。红十三军各部已无力攻打中心城镇。

为了指导浙南党组织的工作，加强对红十三军的领导，党中央于1930年8月派曾任红军总前委常委、红四军政委的潘心元等到浙南。潘心元在瑞安、永嘉、海门等地巡视了1个多月后回上海。10月，潘心元作为红十三军主要领导人再次被党中央指派到浙南工作。12月初，潘心元在玉环境内被捕，惨遭杀害。潘心元的牺牲，使中央重整红十三军的工作受挫。

但各团仍继续坚持斗争。1931年下半年，雷高升等率领红一团在永嘉、青田、仙居边境打游击。国民党视之为心腹之患。1932年1月，国民党“温台剿匪指挥部”纠集2000多人，将红一团围困在不到200平方公里的人烟稀少且极度贫穷的少横坑一带山林中。雷高升虽然率部多次打退国民党军的进攻，但靠野菜野果充饥的生活，已使红军陷入极端的困境。

此时，国民党把单纯的军事“进剿”改为“剿抚兼施”，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密令：对雷高升部“设计诱缉”。雷高升开始坚决拒绝，后来在强敌压境、粮弹严重短缺、部队回旋余地日益缩小、部下已有散伙之意的情况下，为保存力量待机再起，决定率部下山。5月23日，雷高升率70余人按约定来到永嘉岩头东宗祠堂，遭国民党军诱杀。戴元谱等22人当场牺牲，雷高升等7人被捕，其余逃散。雷高升等被押往温州后，于5月28日英勇就义。这就是国民党制造的“岩头事件”。

五、辗转浙西浙南

“岩头事件”标志着红十三军主力的解体，但是浙南的武装斗争并没有偃旗息鼓。红一团余部100多人在金永洪率领下坚持在永嘉、仙居边境顽强斗争。国民党为了彻底消灭红十三军余部，于1933年5月成立了“永嘉、仙居、永康、缙云、东阳、天台六县剿匪指挥部”，采取“移民”“并村”“连保”“封山”等手段实行“清剿”，致使金永洪被捕牺牲、红军队伍解体。与此同时，在西楠溪一带坚持斗争的9支红军余部武装，先后打败省保安队3次“进剿”，并镇压了当地反动民团团总。此后，这些武装分散继续活动，其中部分人员一直

坚持到1938年，与中共永嘉西楠溪中心区委重新接上关系，被派往永嘉、黄岩边境开展斗争。

红二团的斗争一直坚持到1938年12月。红三团在永康、缙云边界一带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11月与红军挺进师一纵队在永康、缙云边境的黄弄坑会师。此外，原红一团战士郑秭深入兰溪、龙游、汤溪、寿昌一带进行革命活动，秘密发展红军1500余人，打出“中国红军第十三军第二师”的旗号，自任师长。但1933年10月，郑秭被捕牺牲。“红二师”也遭到全面破坏。

六、功绩彪炳史册

红十三军全盛时期是1930年的夏秋季节，全军拥有6000多人。在其坚持斗争的前后4年中，活动遍及浙江的温州、台州、处州、金华地区的20余个县，经历了大小百余次战斗，在浙南乃至浙江党的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由于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加上自身建设、革命策略不够成熟等主观因素，最终导致斗争失败，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农村封建势力。红十三军在浙南地区的斗争，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国民党“围剿”中央苏区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兵力，对中央苏区及其他地区的斗争起了支持作用。红十三军

在浙南人民中宣传了党和红军的主张，播下了革命种子，为后来红军挺进师的活动、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以及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凡红十三军活动过的中心区域，后来大都成

为共产党的游击根据地。红十三军指战员的伟大斗争和牺牲精神，一直激励着后人奋勇前进。

红十三军的革命精神和英雄壮举永垂青史！

公益广告



论红十三军斗争的历史启示

◇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理论学习中心组

1930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在永嘉正式成立，是编入正式序列的全国十四支红军之一。红十三军坚持斗争先后长达4年之久，活动遍及浙南20余个县，经历大小战斗一百余次，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浙江的统治，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及其他地区的革命斗争，在浙南乃至浙江党的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红十三军的斗争最终失败，但其伟大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历史昭示着未来。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2020年是红十三军成立90周年，“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自己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红十三军短暂而辉煌的斗争历程，给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留下了许多深刻启示。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1927年八七会议，中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随后各地党组织相继得到整顿、恢复和发展。到1929年10月，永嘉、瑞安、平阳3县共建立106个农村党支部，发展党员984名，加强了西楠溪各地的党组织力量。从浙南武装暴动到红军游击队建立，再到红十三军成立，浙南党组织都起了关键作用。但红十三军成立之后，由于党的领导不稳固、组织建设不健全、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导致部队分散、人心不

齐，最终走向失败。

首先，红十三军主要领导人过早牺牲，领导核心涣散。金贯真担任红十三军政委不到一个月就英勇牺牲，政治部主任陈文杰于1930年9月21日在温州就义。之后，党为了加强对红十三军的领导，派遣潘心元到浙南，他也于12月惨遭杀害。其间，军长胡公冕为解决困境，寻求党中央的更多支持，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并请示工作，这一举措客观上造成了军长长期在外，部队失去领导核心，也失去了向心力和凝聚力。由于红十三军领导人先后牺牲或离去，红十三军军部实际上已不存在。其次，红十三军与浙南特委只是“横的关系”，红十三军直属中央军委领导，未能较好处理与浙南党组织之间的关系。1930年10月26日《中共浙南特委给东方局的报告》中提到，“党在部队中又没有很好的基础”“浙南红军从来没有很好的党的基础……不能在党的领导下正确执行正确路线”。再次，红十三军组织、思想建设薄弱。1927年，“三湾改编”提出要把支部建在连队上。1930年4月，负责浙南红军游击队政治工作的王国桢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需要“整顿旧支部，发展新支部”“每分队组织一小组，每中队组织一支部，一星期开党员大会一次”，但这些意见在随后成立的

红十三军内没有得到贯彻和落实，导致红十三军政治思想工作十分薄弱。红二团团委的报告中就反映过：“我们部队里向来不明了什么政治、什么党务，所以到了现在还没有一些政治工作做出来。”也使得红十三军内部存在“极端民主化”“地方主义”“山头主义”等问题，队伍成分良莠不齐，基层党组织和部队失去纯洁性，最终日渐式微。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回顾中华民族一路走来的艰辛与苦难、成就与辉煌，中国共产党在黑暗中应运而生，带领人民群众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丰硕成果，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在当前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党中央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勠力同心、共克时艰……这些都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也充分证明，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民族复兴是完全正确的。

二、坚持实事求是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前提

“事不凝滞，理贵变通。”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

求，是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来制定和形成指导实践发展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八七会议后，在恢复和整顿党组织的同时，浙南党组织开始广泛深入发动和组织农民。1929年，浙南地区自然灾害频发，而国民党向农民征收的苛捐杂税有增无减，各级党组织因势利导，自1929年至1930年初，多次发动农民暴动，建立农民武装队伍，还组建了红军游击队。1930年初，党中央派巡视员金贯真巡视温州、台州。金贯真充分利用时机，深入各地农村、工厂、街道调查了解情况，多次召开县、区委会，支部会和县、区活动分子大会，对温、台各地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作了许多重要指示。2月28日，金贯真向党中央写了长达1.5万字的关于温、台地区政治形式、群众斗争、武装暴动、党和工人及群众组织等的详细报告。3月，他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浙南武装斗争情况。3月31日，党中央致信浙南党组织，指出浙南应以永嘉、台州为中心，组织地方暴动，建立红军。

可以说，从浙南农民武装暴动到红军游击队和红十三军的建立，都是浙南

党组织从浙南的实际出发，在良好的基础上把握形势，因势利导作出的决定。但是，红十三军建立之时，正值“左”倾主义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在中央“赤化浙江”的指示下，红十三军未能正确认识敌强我弱的形势，坚持以攻打中心城镇为主要目标。1930年5月，红十三军第一团900余人，在平阳、瑞安赤卫队的配合下攻打平阳县城。当时平阳县城驻有国民党李杰三旅一个连，战斗力较强，还驻有保安队、县警备队等。而红十三军装备落后，准备不充分，攻打北门的分队还因为向导领错了路，贻误了战机，使得敌人有喘息之机，得以反扑。红军和赤卫队浴血奋战，牺牲192人。之后红一团撤到城外一个村子里整顿，检点人数时仅剩100余人。平阳战役之后，红十三军仍连连出击攻打缙云、瓯渠、黄岩等县城，劳师远征，虽然赢得了多次胜利，但也使部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无谓消耗了大量革命的有生力量。在红十三军和浙南特委活动时期，浙南地区有1700多名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红十三军团以上干部和浙南特委主要领导成员几乎全部牺牲。

在党的历史上，也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中国共产

党人在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作斗争中深刻领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重要性。正是因为恢复和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在这次防疫战中，党中央突出强调实事求是，各地党组织根据实际情况精准施策，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情况日趋好转后，因地制宜、对症下药，统筹抓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确保群众生命安全和生产生活两不误。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

三、坚持群众路线是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中国共产党在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共同战斗中诞生、发展、壮大、成熟。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也是党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源泉。

浙南本就处于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带，反动势力较强。红十三军的崛起给国民党带来了严重威胁，国民党更是调集重兵进行“清剿”。在这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在游击中心区深入发动群众，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巩

固的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也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但红十三军本身就由游击队发展而来，受“游击思想”影响，成立后也没有及时进行战斗策略转移；加上“左”倾路线的指导，红十三军以进攻中心城镇为重点，没能集中力量巩固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深入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政权，扩大政治影响。加上部队频频出师远征，导致原本的主要活动地区屡遭国民党破坏，部队基本给养难以维持和满足。1930年6月25日，为补充给养、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红一团第二大队中队长徐定魁与黄岩农民武装负责人夏云虎，率队前往台州海门夺取国民党驻军新近运到的枪支弹药。而乐清大台门一带，是进军海门的必经之路。当地16个村庄，庄庄有民团组织。红十三军经过时遇民团开枪阻击，奋勇还击，吓跑了民团。但大台门的枪声同时也惊动了附近黄岩、乐清、温岭3县民团，红十三军随即遭到包抄，遂决定回师。在取道隘门岭途中，又遇民团埋伏，被杀的红军指战员和贫苦农民达471人。乐清等地民团势力强大，红军没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在这一带甚至有永嘉“绿客”烧杀抢劫的舆论。“隘门岭事件”发生过程中，虽有不少群众给予帮助，少数红军的逃脱正是因为群众的掩护和支持。但也有一部分群

众一度将红十三军认作是“土匪”“绿客”。红十三军在发展鼎盛时期，错过了建立根据地、发展群众的最佳时机。革命后期群众产生恐惧心理，大多“杜门绝客”“敬谢不敏”，红军部队只能躲在山里打游击。最终革命活动失去了根据地的依托，也失去了群众的信赖和支持。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90多年来，我国革命、建设、改革能够克服千难万险取得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紧紧依靠人民群众。2020年，面对疫情，党中央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构筑起群防群控的人民防线；同时，坚持统筹推进，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彰显了强烈的为民情怀和使命担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执政之基，只要我们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

四、推进强军事业是民族复兴的有力支撑

兵者，国之大事，攸关国家安危、人民福祉。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国近代百年屈辱史深刻表明，落后就要

挨打，军弱必受欺凌。现实也一再警醒我们，能战方能止战，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支撑，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民族复兴更是海市蜃楼。

红十三军失败的客观原因，正是军事实力的差距、敌我力量的悬殊。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也是蒋介石的老家，国民党的力量在这里十分强大。红十三军的成立，在蒋介石统治的后院点燃了革命的火种，犹如插入心脏的利剑，给国民党当局造成了恐慌。国民党当局下令成立“苏浙皖三省剿匪指挥部”，制定“剿匪”计划，并不断调集、加派重兵对红十三军进行“围剿”，总兵力达一万余人。面对国民党装备精良的优势兵力，红十三军自身的武器装备极为落后。胡公冕曾回忆当时的武器情况，连最起码的“步枪、木壳、鸟枪、红缨枪、大刀等都不够分配，很多人徒手跟着”。加上红军缺乏专业的军事人才，战士以贫苦百姓为主，没有经过军事训练，更没有作战经验，一些部队甚至一直保持原始的械斗方式，这与国民党优良的武器装备、充足的给养、训练有素的士兵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红军鼎盛时期曾达数千人，但敌我双方力量仍是悬殊，几度浴血奋战，终究无法与国民党军队相抗衡。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由于没有认

识到建立武装力量和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革命一度遭受严重挫折。1927年八七会议，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揭示了武装对于革命的重要性。人民军队创建后，一路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付出巨大牺牲，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人民军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在参与救治患者，承担火神山医院收治任务，运送生活物资、防疫物资的过程中，他们令行禁止、敢于担当、英勇奋战，充分彰显了新时代

人民军队的风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的强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没有一个巩固的国防，强国梦就难以真正实现。”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只有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后盾和安全保障。

红十三军精神永放光彩

◇ 永嘉县中共党史学会 永嘉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永嘉县红十三军历史研究会

2019年，永嘉县委、县政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革命老区红十三军诞生地五尺打造浙南红军小镇。山水如画的楠溪江畔，建起了一座美丽的红色教育基地。

一、“红绿融合”发展的典范

永嘉县是革命老根据地县，是编入中央军委正式序列的全国14支红军部队之一——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的诞生地，也是浙南革命游击队的主要活动基地，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红十三军军部旧址被列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第二批名录、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浙江省爱国主义国防教育基地。永嘉县五尺村是红十三军军部驻地，原已建有红十三军纪念碑、红十三军纪念馆、红十三军军部旧址，其碑名和馆名均由张爱萍将军题写。

永嘉县为充分挖掘永嘉的红色资

源，深化党性教育红色品牌建设，于2018年精心谋划了红十三军红色教育基地项目，并以此为契机，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完善规划了浙南红军小镇项目，带动永嘉“红绿融合”发展。为更好地传承红军精神，挖掘红色资源，助力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永嘉县谋划以红十三军军部旧址为核心的浙南红军小镇项目。

位于岩头镇五尺村的浙南红军小镇项目，属于温州市西部休闲产业带市级重点项目，拟列入省重点项目。该项目的的主要内容有红十三军红色教育基地建设，红军小镇环境整治，提升岩（头）（表）山公路（红军大道）拓宽。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4万平方米，总投资约3.2亿元，集展示教育、会议办公、景点观光、住宿饮食等功能于一体。分二期建设，一期红十三军红色教育基地项目于2018年8月1日开工建设，2019年9月28

日建成，10月21日开馆试营运。

经过了一年多时间的建设，红军小镇已初具规模。如今，五尺村经过优化改造，已然整洁有序，旧貌换新颜。

二、党性教育、红色旅游的平台

“红军小镇”项目的核心，是红十三军红色教育基地。红十三军红色教育基地目标定位为打造全省一流、并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红色教育基地项目，是永嘉党性教育、红色旅游的多元发展平台。

该项目总投资达9000万元，分二期建设，其中有第一期用地20亩，建筑面积7361平方米，主要包括红色教育展示区，红色中心广场，会议接待中心，红色拓展基地等。新增展厅1000平方米，房间80个，教室4个，成为一个能同时容纳160余人的，集参观、培训、住宿、餐饮、办公为一体的综合教育基地。展馆中有影像、照片、文字等红色内容，具备集声、光、电于一体的展示方式。

红十三军红色教育基地在整体建筑布置形态上形成了党徽中的镰刀和铁锤向心纪念碑的方式，寓意红十三军为一心向党的精神。在建筑风格上选取了本地特色化的楠溪江风格，使教育基地不仅传承精神文化、更能融合当地传统文化，以真正实现教育的目的；楠溪江

固有风格更是唤醒那个年代红十三军刚创建时的还原场景。充分整合红十三军纪念碑、红十三军纪念馆、红十三军军部旧址、红军路等多个丰富而独特的红色教育资源，打造红色教学展示区、红色中心广场、会议接待中心、红色拓展基地等功能设施。到红十三军红色教育基地举办党性教育活动，可采取回顾历史、现场交流、音像教学和实践体验等多种形式，开展瞻仰纪念碑、参观纪念馆、聆听革命历史、召开专题会议、参加实战体验等系列活动，让党员干部全方位学习感悟红军精神，增强党性教育的现场体验感，使党性教育真正入脑、入心。

三、重温血与火的悲壮历史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尔后，革命的风云在全国燃烧，星星之火，形成了燎原之势。1924年党中央指派谢文锦到温州组织建立了温州独立支部，红色的火种带进了浙南的永嘉。

1930年1月初，中共中央派金贯真到浙南巡视。2月28日，金贯真向党中央写了长达1.5万字的巡视报告，向党中央详细阐述了温台地区的政治形势、农民武装暴动，以及党和群众组织等情况。3月初，中央军委派胡公冕到浙南领导

武装斗争。3月9日，红军游击队在永嘉县溪下的黄皮村成立了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胡公冕任总指挥。3月31日，党中央发出《致浙南的信》，决定正式组建红十三军和成立浙南特委。5月9日，浙南红军游击队攻下枫林后，在枫林“勉园”正式宣布成立红十三军，军长胡公冕、政委金贯真、政治部主任陈文杰，军部驻岩头五尺村，并宣布成立红一团，团长雷高升、政委金国祥。5月20日，红十三军政委金贯真去浙南平阳部署工作，途中在永嘉城区（温州）被捕，当晚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杀害，英勇牺牲。5月24日，红十三军军长胡公冕和政治部主任雷高升率红一团战士900余人和瑞安农民赤卫队汇合攻入平阳县城。6月27日，徐定魁、周明存率部分红军到海门夺枪未果，折回时遭乐清大荆反动民团头目蒋叔南组织的伏击，红军指战员共计471人遭惨杀，史称“隘门岭事件”。7月，根据中共中央和浙南特委指示，以温岭坞根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红十三军第二团，柳苦民、赵胜为负责人。7月间，根据中共中央和浙南特委指示，红十三军第三团在永康成立，团长程仁谟、政委楼其团。8月25日，陈文杰召集红军2000多人，在永嘉霞岙村前溪滩召开大会，宣布红一团扩编为师建制。8月31日，陈文杰、雷高升率红军一

团（师）900余人，攻克缙云县城，宣布成立缙云苏维埃政府，这是最大的一次胜利战斗。9月6日拂晓，红十三军三团（师）攻打壶镇失利，受挫严重。9月，国民党调集135旅和浙保三、四、五、七团及地方武装万余人，对红十三军进行大规模围剿。9月18日，由于叛徒出卖，在上董养伤的陈文杰被国民党抓获；9月21日，在温州松台山英勇就义。9月底，胡公冕在永嘉五尺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化整为零、分散游击、保存实力、伺机再起的应变方针。1931年2月18日，程顺昌在寺基家中突然遭敌人包围，程顺昌与70名战士壮烈牺牲。此后红二团（师）主力部队分散活动。1932年5月23日，雷高升率红军70余人下山诈降，在永嘉岩头东宗祠堂遭国民党军队突袭，当场牺牲22人，雷高升等7名骨干被捕，红一团主力解体。1935年11月，红十三军余部浙西游击队与红军挺进师一纵队一部在永康、缙云边境会师。1936年9月，红十三军余部叶廷鹏组建了浙南红军游击队，与红军挺进师一部在葛藤湖村庄会师，开始新的战斗。

四、传承弘扬红十三军精神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于1930年5月在永嘉县枫林正式宣布成立，军部设五尺村，是编入中央军委正式序列

的全国14支红军部队之一，也是我省唯一一支正式的红军队伍。红十三军鼎盛时期，有红军指战员6000多人，足迹遍及温州、处州（今丽水）、台州、婺州（今金华）所属的20多个县，经历大小战斗百余次，并历经4年之久，沉重打击了当时国民党在浙江的统治。红十三军1500多名指战员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团师以上干部大部分殉难。

红十三军的英勇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其伟大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一）红十三军在浙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敌人“围剿”中央苏区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兵力，对中央苏区及其他地区的武装斗争起了支持作用。

（二）红十三军自成立起，打处州、攻平阳、占缙云、袭瓯渠，红军战士发扬了大无畏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长了人民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三）红十三军在浙南人民群众中，宣传了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播下

了革命的种子，极大鼓舞了浙江人民的革命斗志，影响深远。为后来粟裕、刘英率领红军挺进师入浙，开展南方游击战斗，创建浙南革命根据地起到了奠基作用。凡红十三军和浙南特委活动过的中心区域，几乎都成为我党后来的游击根据地。

（四）红十三军中涌现了大批优秀的革命志士和英雄人物。他们以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无私无畏的牺牲精神，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在监狱里铁骨铮铮、坚贞不屈，在刑场上视死如归、正气凛然。他们的光辉业绩，为革命后代树立了学习的榜样。红十三军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历史。

我们要发扬红十三军“怀抱理想、敢为人先的求真精神；艰苦卓绝、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为民奉献、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激励人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指示，弘扬光荣的革命传统，继承先烈们的斗争和献身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探析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 历史底蕴及现实意义

◇ 陈 敏

1939年7月21日至30日，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省一大”）在浙南基本地区平阳县凤卧乡冠尖与马头岗召开，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浙江党组织召开的唯一一次全省党代表大会，铸就了浙江党的历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也铸就了“省一大精神”，这不仅是我们党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红船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史军史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更是纷至沓来赴“省一大”旧址参观的老同志和全国各地游客的心愿。为此，笔者不揣冒



“省一大”冠尖会场旧址

昧，站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高度，拟就“省一大”的历史内涵及现实意义，提出“坚定信念，百折不挠，植根人民，求是创新”的16字“省一大精神”表述语，与诸位同仁作些粗浅探析，如能收抛砖引玉之效，则吾心遂矣。

一、坚定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浙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之一，也是全国建立党组织较早的省份之一。早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一批浙江籍先进分子就积极参加建党活动，为党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1921年8月初，党的一大最后一天会议在嘉兴南湖举行，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2年9月，浙江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杭州小组成立，隶属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领导。此后，绍兴、海门、温州、宁波、

嘉兴、金华、定海、遂昌、衢州、湖州等地党组织也相继建立，杭州、宁波、绍兴还建立了地委组织。到1927年4月上旬，全省党的组织从1个发展到30多个，党员从3人发展到4000余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浙江党的力量遭到很大损失。为了挽救革命、加强对浙江党的工作的领导，1927年6月，根据中央的决定，以杭州地委为基础建立了中共浙江省委，这是浙江最早建立的省委组织。中共浙江省委成立后，全省的党组织有了统一的领导，推动了全省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1928年11月，浙江省委作出决定，在当年12月底召开全省党的代表大会，并就准备召开全省党代会向中央作了报告。但由于条件不成熟，没有得到中央的批准。至1929年3月，全省有40多个县建立了党的组织，共有党员7000余人。

浙江省委成立后，一直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中，斗争环境极其险恶，省委机关多次遭到破坏，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先后担任省委书记或代理书记的有庄文恭、王嘉谟、张秋人、陈之一、夏曦、卓兰芳、龙大道、李硕勋、徐英、罗学瓚等10人。其中张秋人、王嘉谟、卓兰芳、徐英、罗学瓚等人在浙江牺牲。1929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暂时取消浙江省委建制，划分6个中心区域，建立中心

县（市）委，直属党中央领导。省委撤销后，实际先后建立了杭州、宁波、永嘉、台州、湖州、兰溪、永康、建德、东阳等9个中心县（市）委。但是，这些组织也先后遭到严重破坏，到1932年底，除少数地区尚有党组织活动外，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党组织已被破坏殆尽。为了恢复浙江党的组织，1933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杭州建立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但不久就遭破坏。

就在浙江内地的革命斗争遭到严重挫折的时候，浙赣、闽浙和浙皖边界的革命斗争方兴未艾，并迅速向浙江境内发展，在浙西的开化、江山、淳安等地建立过党组织，有特委、中心县委和县委等，分别隶属于中共赣东北省委、闽浙赣省委和皖浙赣省委及有关特委领导。1935年3月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后，与闽东特委联合建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刘英任书记，先后下辖浙西南特委、闽东特委、浙东特委、浙东南特委、浙南特委5个特委。1935年9月至1936年5月，国民党成立以卫立煌、罗卓英为正副总指挥的“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集中7万兵力对红军挺进师进行“围剿”。1936年4月在安徽鄣公山成立了由关英任书记的中共皖浙赣省委，省委下辖的下浙皖特委和浙皖特委机关都设在浙西，上浙皖特委在浙西境

内也有活动。但后来由于国民党的“围剿”，浙西游击根据地全部丧失，这些地方党组织都遭到破坏。1937年1月至8月，蒋介石采取“北抚南剿”的方针，调集刘建绪第四路军和各地保安团共10万兵力，对闽浙皖赣四省边区的红军进行残酷“围剿”，浙南地区是这次“围剿”的重点。在敌人疯狂的“围剿”中，为了切断红军和群众的联系，采取搜山烧山、移民并村、计口授盐授粮、整顿乡保甲组织、实行连保切结以及建立情报网站等反动措施。刘英和粟裕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将挺进师游击区的范围扩大到浙江南半部的30余县，红军还一度活动到蒋介石的老家奉化附近，使敌军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最后，敌人也不得不沮丧地承认：“以数万之众，剿千百之匪，数月于兹，未奏肤功。”红军在浙南武装斗争的旗帜一直高高飘扬。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浙江各地党组织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活动在浙南地区的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把迅速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作为当务之急，在原有的中共浙南地委、浙东南特委基础上，又恢复了中共浙西南特委、温州市委及一批县委。同时又在平阳山门举办了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培

训了130多名抗日骨干。与此同时，驻南京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及南京、上海、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各地新四军办事处及全国其他地方的党组织也先后陆续派党员来浙江工作，恢复和发展浙江党组织。1937年11月，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1938年2月改为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员会，在省临工委和省工委的领导下，先后组建了浙东临时特委、台州临时工委和一批县级党组织。

在全省各地党组织纷纷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新形势，加强对分属不同系统的全省各地党组织的领导，成立统一的中共浙江省委已是十分必要和非常紧迫。1938年3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到平阳山门，传达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东南分局的指示，成立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待中央批准后转为正式省委。5月，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在平阳玉青岩村成立，同时撤销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中共浙江省工委。同年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浙江临时省委转为正式省委，刘英任书记，省委先后下辖宁绍特委、浙南特委、金衢特委、处属特委、台属特委、浙西特委。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和省委建立后，认真贯彻中央和东南分局的指示，大力发展党的组织，使全省党组织获得了大发展，各级党组织普遍建立

起来。从而使浙江党的组织成为一支在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具有重大政治影响和深厚群众基础的中坚力量。

从1939年初开始，中共浙江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为迎接党的七大的召开，积极筹备召开全省党的代表大会。1939年2月1日，省委作出《关于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工作的决议》。1939年4月间，各县党组织根据省委的决议，召开了党代表大会，总结了本县党的各项工作，选出了参加本区党代表大会的代表。5月至7月，宁绍特委、金衢特委、浙南特委、处属特委、台属特委相继召开了党代表大会，总结各特委近年来的工作，确定各地今后党的工作任务，并选举了出席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1939年7月21日至30日，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平阳县凤卧乡的马头岗和冠尖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26人，列席代表9人，代表全省近两万名党员。大会通过了刘英同志代表省委所作的政治报告，还通过了《关于目前抗战形势与浙江党的任务的决议》等一系列文件。会议全面总结了中共浙江省委重建以来的工作，确定了今后的任务和党的工作方针，选举了以刘英为书记的新的省委领导机构和出席中共七大的浙江代表、后补代表。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



“省一大”马头岗会场旧址

表大会，在浙江党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望浙江党的发展史，我们看到，浙江各级党组织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出于斗争的需要，或不断地变换、调整或被迫停止活动，但浙江共产党人在险恶的环境中，以必胜的信念和革命大无畏精神，不怕流血牺牲，激励了大批革命者和群众在险恶的环境下前赴后继，推动了革命的胜利发展。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所形象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实在是太贴切了。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是老一辈共产党人和革命先辈坚定信仰，百折不挠，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结果。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让这些革命先辈那样顽强地战斗着？我想，

支撑他们流血牺牲、奋勇向前的，是心中熊熊燃烧的理想火炬；是跟着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翻身解放的坚定信仰，正是这种信仰与信念，使得他们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使他们在同伴们倒下的地方，一次次倔强地站起来，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因此，“省一大精神”从根本上说，既是中共一大精神的延续、又是浙江精神的重要来源，她给予当代共产党人的最大启示，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浙江夺取革命胜利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支柱、是灵魂。

当下，虽然硝烟散尽，但精神永存。弘扬“省一大精神”，就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到改革发展具体进程中，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始终坚定为理想信念而奋斗的自信，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成功应对“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唯有这样，才能以实际行动为完成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而不懈奋斗。

二、植根人民的为民精神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平阳成功举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平阳

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回顾历史，早在大革命时期，平阳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平阳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持续不断。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叶廷鹏，在浙南革命斗争遭受严重挫折、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在平阳农村坚持斗争，并于1932年冬，成立了浙南红军游击队，以后又建立了中共浙南革命委员会，在平阳北港和瑞（安）平（阳）边开辟了一块纵横30余里的秘密工作地区。同年底，刘英、粟裕率领的红军挺进师转战浙南，使浙南的革命斗争成燎原之势。刘英和粟裕率领红军挺进师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的进攻，并经受了蒋介石嫡系主力部队的大规模的“围剿”。

1937年春，刘英率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机关来到平阳北港，以平阳为中心，领导浙南游击根据地的斗争。抗战爆发后，活动在浙南各地的红军挺进师指战员陆续到平阳山门等地集中，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红军挺进师在此创办了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和军政干部训练班，为抗日救亡运动和准备武装抗日培养了大批干部。平阳成了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红军挺进师活动的大本营。在这里，党

群关系、军民关系很好，刘英领导的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红军挺进师，以及抗战爆发后建立的浙江省委十分重视做好群众工作，尤其重视做好党和红军经常活动地区的群众工作。刘英就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模范。他总是和群众打成一片、善于团结五湖四海，每到一处，他总是召集一些群众，包括地方上的长辈和有地位的头面人物开座谈会，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调查当地的社会情况。红军挺进师初到浙南时，主要来自江西的红军挺进师指战员对当地方言一句也听不懂，当地群众也听不懂指战员的话。刘英同志以身作则，带头学习浙南方言，把学好方言作为开展群众工作的工具。他把会讲普通话又懂方言的两名本地干部调到自己身边做翻译，还将方言与普通话一一对照，注上音，抄在小本子上，反复背诵，后来，他不但能听懂、而且还能讲浙南方言。这样，刘英与群众的关系就更密切了，浙南游击区的群众都亲切地称呼他“可夫同志”。刘英在回顾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时说：“群众对红军的热望与拥护，确实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某些地区甚至同老苏区一样，群众自动替红军担任运输、向导及治疗伤病员等，并自动组织游击队，进行分粮和策反工作。”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是在日本全面侵华、国民党顽固派疯狂反共的严重形势下召开的。1939年7月21日，来自浙江省各地的26名正式代表冒着生命危险赴平阳县凤卧乡参加会议，选举产生浙江省委和出席七大的代表。会议期间，凤卧乡300多名共产党员带领1000多名自卫队员和妇女联合会员，直接或间接地为大会提供后勤保障。冠尖村村民郑永暖、马头岗村村民翁吉忠当得知“省一大”会议需要房子时，马上腾出自家的房子作为大会的会场。当会议开到第四天的时候，省委担心在冠尖举行时间过长，容易被敌人发觉，第二次大会发言便在当天夜里转移到和冠尖相距8公里的马头岗村进行。当天夜里沿途百姓都把自家的狗关了起来，防止它们的叫声惊动不远处的国民党乡公所……为了保护好这次会议，当地村民自觉承担起了地勤、通讯、后勤和卫生等工作。在他们的密切配合下，为期10天的大会自始至终安全、顺利地召开。

可以这么说，当年，“省一大”的胜利召开，是浙南和平阳老区人民用一颗颗红心保卫出来的，她彰显了人民群众推动革命的伟力。尽管当时的浙南山区那么苦、那么穷，斗争那么残酷，但事实证明，只要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党就能立足扎根，发展壮大。“省一大”给我们最深刻的

启示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群众是力量之源，革命成功尽在依靠群众支持和集中群众智慧，形成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历来是我党我军的工作方法和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着人民的关注。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失去民心。要克服这一最大危险，唯一的办法是学习革命先辈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坚决走群众路线。联系当下，无异于我们正面临着事关民族兴衰存亡的新长征，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下一代能否向革命先辈一样，在严峻的历史考验面前，每一个共产党员和党政机关各级干部都必须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做到民有所呼，政有所应，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把人民群众作为创造历史伟业的根本力量，自觉拜群众为师，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全部工作中，把群众的笑脸作为我们一切政策、政绩的试金石，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三、求是创新的担当精神

抗战时期，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和省委的其他同志，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还是在错综复杂的敌后，他们都临危不乱，坚持求是创新，体现了老一辈共产党人敢于担当的精神品质。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刘英能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大刀阔斧地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成功地与黄绍竑为首的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建立了比较融洽的统战关系，推动黄绍竑颁布了以我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基础制订的《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从而使抗战前期国共合作的浙江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工作中，刘英不但亲自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还通过和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关系，将来自省内外的100多名地下党员、进步文化人士和爱国青年安排到浙江国民党各级政府机构，开展统战工作，取得很好的效果。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浙江的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仅浙南方面参加实际工作的就多达7万余人，起中心作用的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就有8000多成员，抗日救亡声势之大、发动群众之广，被当时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誉为“东南诸省之冠”。为加强对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中

共浙江省委还专门设立了青年运动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和妇女运动委员会，动员组织各界群众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来。与此同时，刘英还派遣大批党员和进步青年进入国民党浙江战时政治工作队，使政工队成为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形式。全省共有75个县建立了政工队，队员达3000多人，许多政工队是在党组织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对浙江各方面抗战工作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1939年春，周恩来同志视察浙江时充分肯定了刘英主持的浙江省委的工作，他说：“在东南战场上，浙江是站在前进的地位，是值得其他各省仿效的。”

抗战初期，在刘英和浙江省其他同志的艰苦努力下，浙江党组织和党员人数有了很大发展。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各级组织“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并强调这是“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刘英主持的省委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连续三次向特委、县委发出指示信，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吸收大批的先进的工农和知识分子与青年入党”，在发展工作中“不应限于狭隘的地区和原来的基本地区，应该向着城市和市镇为中心积极去进行发展工作”。省委的一系列指示，很快在

各地得到落实，大量吸收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青年入党，从而使浙江的党组织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同时省委还非常注意党员的质量，对新发展的党员，十分注意培养教育。仅一年多时间，全省先后建立了浙南、处属、台属、宁绍、金衢、浙西等6个特委和55个县委（县工委），党的支部组织遍及城乡各地，党员从三年游击战争刚结束时不到千人发展到近两万人，成为中共长江局领导的南方13个省党员发展数最多的省份之一。这是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顺利召开的组织基础。从此，浙江的党组织成为一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具有重大政治影响和深厚群众基础的中坚力量。中共东南局曾对浙江的工作作了很高的评价：“浙江的工作正确地执行了中央政治路线；运用了比较进步的浙江政治局势，大大的发展了工作，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普遍地建立了党组织；利用政工队与公务人员，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基本上正确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浙江党在东南局领导下，是国民党区域的模范。”

在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一系列文件中，也能验证中共浙江省委的革命同志当时坚持从实际出发，善于在复杂的环境中统揽全局、缜密分析、采取和实施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

施。比如，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目前抗战形势与浙江党的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分析了当时全国和浙江正在急剧发展变化的抗战形势，指出了浙江政治形势的特点，将由抗战第一阶段的辅助地位转向抗战相持阶段的主要地位，并据此提出了7项紧急任务……所有这些都诠释了以刘英烈士为代表的浙江共产党人的当担精神和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彰显了党的领导的伟力。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当前，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正加快向“两个高水平”迈进，这是当代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如果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将要在新时代树立的新的里程碑。那么，笔者认为，在奋进新时代的道路上，我们新时代共产党人永葆青春活力的最好方式，就是要践行老一辈共产党人求是创新的担当精神，进一步弘扬刘英烈士及省委其他领导的求是创新精神。在风险与挑战面前，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求是创新、攻坚克难的风骨、气节和胆魄，接续奋斗、顽强拼搏，有效应对各种挑战、抵御各种风险、克服阻力、化解矛盾，坚决打好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战，以艰苦奋斗、

戒骄戒躁的作风，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唯有这样，才能一步步把革命先辈开创的基业发扬光大，真正夺取新的伟大胜利。

总而言之，“省一大精神”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她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省一大精神”的提炼、弘扬和践行，不仅回顾总结了历史，生动地反映了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风范，更是指导现实、引领未来，穿越时空。她必定会给今天继续前进的中国共产党继续在“四个伟大”的新长征中带来深刻启示，彰显重要的时代价值。

（作者单位：中共平阳县委党史研究室）

参考文献：

- 1.《刘英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
- 2.《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
- 3.《功业垂千秋 精神励后人》：浙江日报2009年7月21日第三版。
- 4.《中共平阳县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
- 5.《弘扬革命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浙江日报2019年7月24日第三版。

1938年霍乱大爆发 温州各界协力防疫

◇ 王长明

1938年6月，温州爆发了严重霍乱，当时的温州军政当局采取一些积极的举措予以防治，社会各界亦踊跃参与。至同年9月，疫害基本结束。日前，我有幸发现此次防治霍乱的珍贵史料，得以初步了解这段被遗忘的防疫历史。

全面反映此次瘟疫防治的史料是1938年12月编印的《温台防守司令部防疫处工作报告》。根据这份《工作报告》，这场瘟疫之发端可追溯于前一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之后。因其时幸值晚秋，疫势尚未嚣张。但因除疫未尽，加之沪战以来，温州地位顿形重

要，成为内地各省与沿海交通之枢纽，商业繁盛，旅舍林立，人口骤然增多，以致未及一年便爆发疫害，且势如燎原，邑人有晨不预夕之感。

设立防疫处与防疫委员会

为此，温台防守司令部（始设于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负责温州、台州沿海防务）特组设防疫处与防疫委员会。防疫处专司疫害防治，以曹建东为处长，杨玉生（瓯海医院创办者之一）为副处长，曾在联立中学（旧址在今名城广场）、东山书院（旧址在积谷山西南麓）等处办公。防疫委员会则召聚永嘉医、商、学、党、政、军等各界人士，以动员全社会群策群力。

防疫委员会中有杏林高手：施德福、管仲瑜、黄问羹、郑求是、陈梅豪、方朴如、李素冰、吕泰然等来自白



←消毒隊工作之四（井水消毒）



累德、董若望、瓯海等温州各医院的院长、名医，有商界领袖杨雨农、翁来科、汪惺时等，还有文化界名人方介堪、陈仲陶，方介堪甚至还曾为防疫委员会做会议记录，并为委员合影题字。此外，自然还有温台防守司令、一零七师师长段珩，浙江省第八区（温州）专员兼保安司令蒋志英，永嘉县长张宝琛，国民党永嘉县特派员吴国钤，王超凡（时任职务不详）等党、政、军代表。

设立时疫医院救治病患

因当时霍乱患者激增，城内各普通医院已无不堪重负、且易传染，故而组建时疫疫院（疫病临时救治医院）专门隔离、收治霍乱患者，其中时疫医院第一院设于大士门增爵小学（旧址在今温七中），第二院院址不详。

第一院7月5日至8月18日共收治病患计男1273人，女656人，死亡男127人，女52人，死亡率男9.9%，女7.9%。第二院进院人数男250人，女167人，死亡男14人，女13人，死亡率男5.6%，女6.48%

当年的医护工作者还将患者就诊、住院情况及其年龄、地域、职业做了统计分析，并制作成曲线图、柱状图、饼状图，虽然当年尚无电脑软件，但绘制得仍然十分精细、明了。收治的染疫者以城区九镇居民为主，以成年人为主，以在家做家务者与工、商、农职业者为主。

免费疫苗注射

治疫不如防疫。防疫处组建注射队，推行霍乱疫苗免费注射。温州驻军一零七师首受注射，故全体官兵，无病

患发生。永嘉各机关各学校，均经注射，亦完全无恙。时疫医院所收2000余病人，其中只有轻患者一人曾注射一次，其余此前均未经过防疫注射。但是，当年一般民众的卫生常识极度欠缺，虽言之谆谆，说者唇焦舌敝，竟置若罔闻，对打预防针抵制避匿诋毁，故极难推行。

注射队先是挨户注射，接着又采用拦路强制打针之法，虽历经三个月努力，总计在永嘉（包括今温州市鹿城、瓯海、龙湾三区及永嘉县）及乐清注射99417人，其中永嘉（温州）城区17万居民，接受注射者约8万人，但防疫注射仍未能普遍推行。

《工作报告》感叹：“此诚堪叹我国科学之落伍，有以至于此，遂造成我民族最莫大关系之损失，生命之夭折者也”，深望“先知先觉之父老，详加解释者矣”。

化验与消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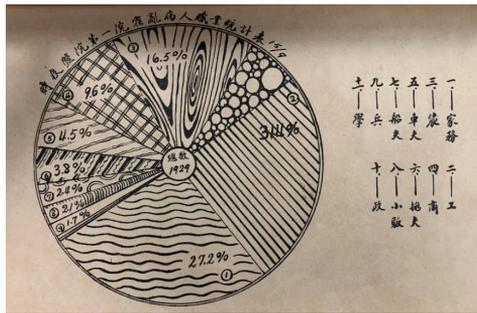
防疫处设化验科，主要是对冷饮食物和饮用水源进行化验。饮用水不洁为霍乱之主要原因之一，当年温州民众饮用水大都仰给于水井、水船。故于7月5日至8月28日，共对城内外公私水井及池水、泉水538处进行化验，发现约九成

以上现霍乱红色反应或大肠杆菌。《报告》列出各处水井、泉水、池水的具体位置、检测时间及结果，如今城内外水井绝大多数已不存在，而《报告》却为探寻古井遗踪者保存了宝贵的史料。此外，还对售卖饮用水之水船化验109件，正常者46件，余63件均呈霍乱红色反应。

7月11日至8月1日，共计化验永嘉各店摊所售冷饮食物共65件，包括冰淇淋、刨冰、凉粉、酸梅汤、生水冰、熟水冰、汽水、冰牛奶等，其中检出有霍乱菌者29件，有大肠杆菌者1件，正常者35件。

有病菌食品不仅涉及沿街摊贩，更有中山公园西湖菜馆、中山公园醉月楼、四顾桥公生园、中正路稻香村、大南门晶光冰厂、华大利菜馆等著名酒楼、字号。为此，明令禁止售卖以井水为原料的生冷食品、饮料。

防疫处组建消毒队，实施病患家中消毒（共964家）、时疫医院消毒、运送



病患的黄包车消毒。当然还有极为重要的水源消毒，对检出非正常可用的水井全面消毒。此外，8月12日至8月31日，还消毒水船883艘。

改善环境卫生

（一）全城清洁大检查与大扫除。发现河边一面淘米洗菜，一面洗涤便桶，屠猪店将猪之排泄物洗入河内，垃圾、污水倾倒入河等现象普遍存在。最令人意料不到的是瓯海医院流出之污水臭气扑鼻，一直无人管理，有传播病菌、贻害性命之虞。为此，防疫处制订计划，以逐步改良。

（二）改建公厕。本城公私厕所600余，皆污秽不堪，臭气四溢，粪蛆满坑、苍蝇云集，实为疫疾传染之根据地。

故在华盖山下建第1号模范公厕。耗时25天完成，耗资563元（此时法币购买力高，100元可买一头黄牛），可容16人（男10、女6）如厕，有纱窗纱门可以防蝇，粪沟粪池以水泥制成，可防水源污染，有空气亭、出气洞，保障空气流通，并有管理员住室，负责维持内部之清洁，每日用水冲洗。还拟于城东镇宝华局附近建2号模范公厕。又设计3号模范公厕，以造价200元为原则，令各镇参



照图样建造。

（三）改良垃圾箱。因本城垃圾多随地倾倒，现有垃圾箱多样式不合，破旧不堪，故制造自动木盖之垃圾箱10只，交由警察局分置各镇作为模型，并限令各保按样制造。

筹款与收支

当时，除防疫委员会以外，还组织了募捐委员会与经济委员会，前者管募捐，后者管收支，翁来科、杨雨农等人都有防疫委员、募捐委员、经济委员三重身份。

7月4日至11月30日，共收到永嘉县抗日自卫委员会、永嘉航业公会、浙瓯日报社、交通银行、温州地方银行、瓯海关、永嘉合作金库、永嘉县商会主席杨雨农暨各行业公会捐款、翁来科在沪募捐，各机关学校公务人员一日所得捐、温州各商号及个人捐款，24425.043

元，支出21917.55元，节余2507.493元。

这里值得的一提的是，《工作报告》将各项捐款及支出逐一系列公布，同时将防疫处及下属化验科、消毒队、注射队、时疫医院第一、二院等各单位支出均清晰列出，在财务信息公开与透明等方面的确有可圈可点之处。

医护及一般工作人员

《工作报告》除收录各位委员的信息外，还将参与防疫工作的医生、护士、消毒队员、注射队员、化验员、会计、文书、庶务、司药、药剂师、事务员、调剂员、文牍员、技术员的姓名、性别、单位、职务、籍贯、住址亦逐一列出，让这些小人物的姓名能载入史册，值得称道。

其中有不少人员是从外地来援助温州防疫的。本次重大瘟疫，单靠温州一地之力量显然无法应对。故而在疫情发生后温台防守司令段珩电请中央防疫处



来温襄理，并请发给大宗霍乱疫苗，省民政厅曾派员到温州视察疫情。而且为节省经费，还曾在温自制疫苗1000瓶，先经动物试验，再由化验科自行注射试验，因疗效颇佳，由注射队领用700瓶。

尾声

1938年9月12日，温台防守司令部防疫处召开第二次常务委员会议，会议经讨论决定，鉴于本埠霍乱业已扑灭，自16日起缩小范围，继续治疗残余疫病，并兼办社会卫生事宜。对于仍需治疗的少数患者暂由瓯海医院代收，所需经费由该处供给。必须承认，经各方共同努力，此次瘟疫防治取得了显著成效，“当赣、鄂、豫、湘、粤均告疫炽之时，而永嘉已幸告小安”。

但是，该《工作报告》收录的《为普遍注射告各界人士书》（未注明时间，当在八九月间发布）中亦坦承在城区疫病日渐减轻时，“试观各病院中，时疫病人其危笃者、死亡者，均为来自乡区之农民。考查远乡及邻县疫势，本月内疫死者成百累千，往往一乡一保中，数日间疫死百余人”。这当然只能从抗战时局与当日之国力、卫生防疫体制与效能、国民智识等方面去寻找根源了。

解放初期泰顺的三次麻疹大流行

◇ 陈蔡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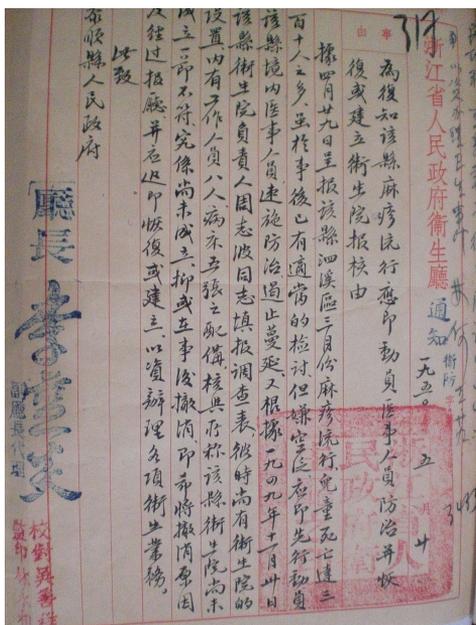
解放初期，泰顺没有公路，山高路远，村落分散，来往都靠步行。县城距省城杭州水陆交通500多千米，距温州水陆交通200多千米，平均每个区到达县城约45千米山路。长期以来，由于县内医疗条件、水平低下，百姓卫生习惯和防病意识较差，因此，霍乱、天花、白喉、麻疹、疟疾、梅毒、痢疾、肺结核、伤寒、丝虫病等疾病长期盘踞，严重危害百姓的身体健康。

—

1949年5月，泰顺县解放。9月开始，各区、乡、村人民民主政权相继建立。当时，泰顺县的重点工作是镇反、剿匪、开展生产、救灾度荒及准备土改等。然而，就在新旧政权交替、百废待兴的关键时期，一场可怕的瘟疫正悄然逼近。

8月至12月，泰南区（现三魁、仕阳等镇属地）发现麻疹疫情。是年底至1950年春，由于阴雨连绵，前后延续3个月之久。恶劣的天气助长了麻疹发病率，麻疹开始传入泗溪区（现泗溪、彭溪、雅阳等镇属地）。三四月份麻疹到达流行高峰。截至4月，泰南、泗溪两区2至5岁儿童麻疹患者死亡335人，其中泗溪区205人，泰南区130人；6岁至15岁儿童麻疹患者死亡165人，其中泗溪区105人，泰南区60人；合计患病儿童死亡500人（本文数据均来自县档案馆档案资料）。

当时泰顺县医药卫生基础差，西药和卫生人才稀缺。1949年7月，县人民政府设立医务所，仅有三名医务人员，医疗设备极其简陋。麻疹大规模流行后，迅速蔓延至县政府所在地莒江。1950年4月初，县政府一面紧急报告上级请求救援，一面指示各区动员群众采取



省卫生厅指示泰顺动员医事人员防治并恢复或建立卫生院的公文

土法治疗，以减少病患死亡。同时，要求各区将麻疹疫情按旬上报县政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各地未呈报麻疹疫情。直至27日，县委召开第二次干部扩大会议，根据泰南、泗溪两区政府报告总结统计，才知晓此次麻疹蔓延的严重性。29日，县政府将麻疹疫情上报省卫生厅。5月17日，县政府下发通知，批评泰南、泗溪两区政府毫无责任心，对人民生命漠不关心，要求深刻检讨，按级追究。并强调，今后如不按旬报告将受严重处分。

省政府卫生厅接到麻疹疫情报告

后，高度重视泰顺县的麻疹疫情，多次就如何防止疫情继续蔓延等作了指示，要求动员本县的医务人员从速医治。同时电令温州地区专署组织医疗队赶赴泰顺进行防治。是年5月和7月，两次派出的省、地医疗队到达泰顺，与县医务所人员在南溪、东溪、凤垟、柳峰等地展开治疗，向群众宣传麻疹疾病防治知识，治疗麻疹患者306人次，加上天气逐渐转晴转暖，泰顺县麻疹疫情基本得到控制。这次麻疹疫情，还引发了多种传染病流行，据统计，泰顺县共死亡900余人。

二

1951年冬，泰顺县土改全面展开，群众聚会频繁，麻疹疫情又趁势蔓延。到次年1月中旬，泰顺县麻疹疫情已十分严重，尤其是仕阳区为最。此时，泰顺县人民政府虽成立了卫生院，医务人员增至9人，但每天要求派医前往治疗的乡镇就有七八个，卫生院应接不暇，无法控制麻疹疫情。麻疹疫情大流行，泰顺县7个区有6个区发生疫情，麻疹患者达9408人，占泰顺县总人口的5.6%。

2月中旬，泰顺县人民政府与土改指挥部电请温州地委专署，要求派遣医师前来救治。专署接电后，着手组织医



淌过急流的医疗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泰顺医疗队下乡情景

疗队，同时电令泰顺：动员泰顺县中、西医人员集思广益，认真研究麻疹的治疗方法，并组织他们分赴传染病流行地区进行治疗。专署强调，该项工作关系到广大群众的生死存亡，各级领导必须予以重视。

2月23日，省防疫大队第二防疫队到达百丈口，即奔赴仕阳区开展防治工作。3月15日，省防疫大队第二防疫队增调3名医务人员，省立医院、省工人医院调来16名医师和护士，在百丈口成立防疫指挥部，指挥泰顺县麻疹防治工作。3月28日，温州临时防疫第二防治队到达百丈口，设立麻疹防治站开展工作。

在开展麻疹防治工作的同时，泰顺县委根据省委、地委关于扑灭疾病抢救病人的紧急指示，于3月上旬成立县防疫委员会，苏松政委兼委员会主任（苏松

时任县委副书记，主持工作），何剑锋县长、竹明山大队长兼委员会副主任，下设秘书、防治、宣传等小组。10日，县委紧急发文：所有发现疫病流行的区、乡以治病救人为紧急突击任务，其他各项工作应围绕此项工作进行；未发现疫病的区、乡必须作积极预防准备，争取主动，发现疫情及时上报。

泰顺县委为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全力防治麻疹。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各疫病流行区、乡成立防疫组织机构；二是组织医务工作者分赴各地治疗，发动乡村中、西医医务人员参加各疫区治疗；三是抽调小学教员，通过短期培训后，作为防治麻疹的辅助力量；四是划定疫区，在疫区内停止对外交通，制止所有商业交易和亲朋往来；五是在疫区内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其间，派遣16名医务人员下乡指导麻疹防治，在重点地区设立防疫站，日夜出诊，抢救治疗病人。县防治人员还一面深入乡村调查，一面开展宣传，动员群众护送患者到防治站集中治疗。如罗阳区，在县卫生院内设立防治站展开工作，调查、宣教、治疗三个方面工作分头并进，同时发动文教界协助宣传。但由于罗阳为县城，居住人口多、来往行人亦较多，接触频繁，很难做好隔离，再者患者家属不愿接受集中治疗，防治队人员只好夜以继

日出诊治疗。

截至5月11日，省防疫队、地区防治队先后调来医务人员 34 人，经过 79 天的全力救治，基本控制住泰顺县麻疹疫情。两医疗队救治范围涉及百丈、罗阳、筱村、大安、仕阳、泗溪 6 个区 44 个乡镇 100 多个村，诊治麻疹患者1157 人，治愈 1136 人。此外，还诊治其它病患者1334 人。据统计，至5月底，泰顺县共治愈麻疹患者 7510 人，占总患者总数的 79.8% ；死亡人数595 人，占患者总数的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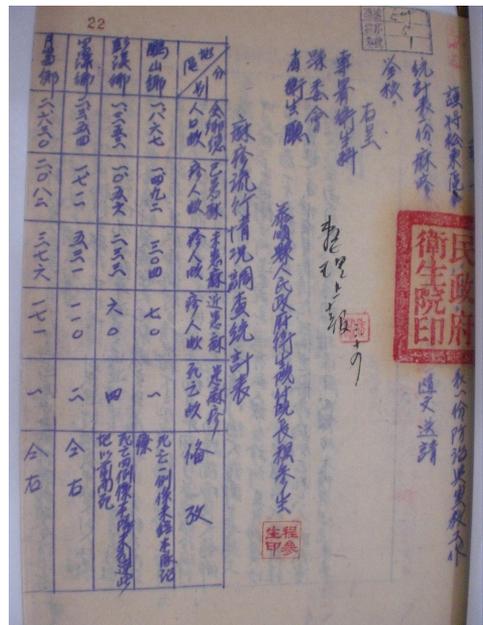
三

自1952年麻疹大流行后，除百丈区外，泰顺县各地散发性与地区性流行一直没有停止。因此，1953年泰顺县麻疹总体呈散发性流行，一年四季连续不断，个别地方有区域性流行特点，松东（现彭溪、雅阳等镇属地）、泗溪两区流行最为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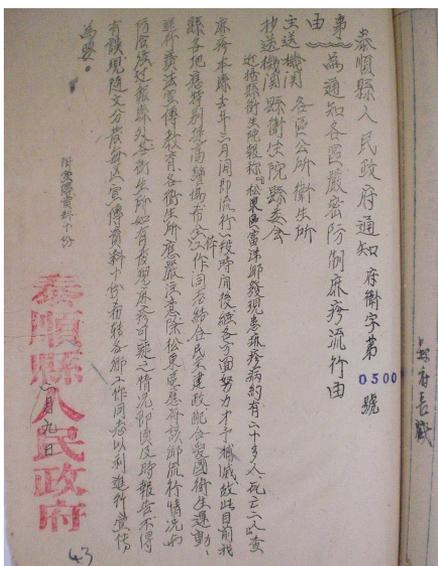
2月28日，县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及时派出医生防止麻疹的进一步流行。在往年防治麻疹的基础上，当时群众对科学医治麻疹的信心有了较大提高，但对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氛围尚未形成；而麻疹患者又分散在各个村落，限于医务人员缺少，县卫生院不能全面

出诊或巡回治疗。因此，各地麻疹的诊治基本上由各地医疗机构处理，情况严重的地区动员地方开业医师参与防治工作。县卫生院根据具体情况需要，再组织防治队前往治疗。

为了预防麻疹等疾病的流行，县委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在第二次麻疹大流行后，即1952年5月，县委就成立了爱国防疫委员会。6月，泰顺县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掀起大扫除、灭“五毒”运动（指以消灭鼠、蚊、蝇、虱、蚤为重点的爱国卫生运动）。接着，各区相继成立爱国卫生运动分会，分会下设121 个卫生站、291个卫生小组。是年底，



松东区麻疹流行情况调查表



县政府通知各区防治麻疹流行，配合爱国卫生

泰顺县共有 8.7 万人签订爱国卫生公约。在环境治理方面，开展了清理垃圾行动，疏通阴沟，清除蛆虫；填塞脏、乱、差的茅厕，改建和新建一些公厕；开展捕蛇、捕鼠行动，进一步消除病毒源头。在饮水卫生方面，改善水井，消毒水源。1953年，泰顺县各地又开展了以除“四害”（指苍蝇、蚊子、老鼠、麻雀）为中心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8月，县委、县政府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我县夏季爱国卫生宣传月活动》的通知，要求以集镇、机关、学校为重点，广泛宣传夏季传染病预防、妇幼保健知识，倡导饮食卫生及个人卫生。各地通过召开会议、组织读报、举办文娱活动

以及利用民校、黑板报、墙报、夜光灯标语、幻灯片等形式，广泛宣传卫生知识。爱国卫生运动是一次深刻的、系统的、群众性的卫生知识宣传教育活动，泰顺县通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明显地改善了卫生环境，改进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习惯，提高了大多数群众的卫生科学水平，增强了群众的卫生防疫意识。

县委、县府还着手加强泰顺县医疗工作的建设。在第二次麻疹大流行后，百丈、大安、泗溪、仕阳、松东5个区的卫生院先后建立，并聘请多位省、市医疗队员继续留在泰顺工作。1953年，又从温州、奉化一带聘请多位专业医师到泰顺工作，再加上温州医校的毕业生也陆续分配到位，泰顺县医疗技术力量得到不断加强。是年，公立医疗机构人员共有61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41人，私人开业医药人员164人。同时还在泰顺县范围内，分两期训练了一批防疫卫生员骨干，共196人，分赴防治麻疹一线。

1953年，泰顺县共组织巡回医疗11次，动员8名开业医生配合卫生院，组成防治麻疹医疗队，下乡进村，有重点地开展麻疹防治工作。据统计，全年麻疹初诊2211人、复诊2481人，死亡人数减低到43人。百丈镇由于麻疹预防工作做得好，没有发现1例麻疹病患。

（作者单位：泰顺县党史编辑部）

温州现代工业体系建设历程

——新中国建立初至“文革”前

◇ 张声和

温州工业体系，是国民经济强有力的支撑。新中国走过的70年，承载着温州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工业体系的光辉历程。温州人民在党的带领下，艰苦奋斗，经过“三年恢复期”和4个“五年计划”奠基期，再经过改革开放和温州模式的创建，建立起了具有温州经济特色的工业体系，为温州的经济社会发展迸发出强大活力，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本文根据有关工业史料，对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温州工业发展走过的几个历程作简要回顾。

—

1949年5月7日，温州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前，温州工业基础薄弱又饱受战争创伤。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外国和官僚资本的双重压迫下，没有自己的工

业体系，基础薄弱，机器设备和原料大部分依赖进口，产值微乎其微。

温州是浙南的首要城市。温州和平解放之初，城市拥有50万余人口。没有工业的恢复，城市发展无从谈起。根据胡景城市长代表温州市军管会关于《温州市人民政府解放后5个月来的工作报告》中反映出的情况，当时的温州百业待兴。在党的领导下，各界人士和民众热情高涨，温州工业和商贸业很快得到恢复。

从1949年至1952年的数据反映，温州工业恢复较快，是工业形势渐趋好转的时期。“在经济上要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变小规模轻工业手工业生产为现代化的生产”的奋斗目标，是在1949年10月召开的温州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提出的。

1949年，温州市区工业企业372家，其中使用动力的79家，百人以上略

具规模的仅9家，绝大多数是工场手工业作坊。其所有制结构，国营企业2家、合作企业1家、私营企业369家，其中普华电气公司光明火柴厂、西山陶瓷厂大明蜡纸厂、富华布厂、清明化工厂等均具有一定规模。全部职工数5212人。手工业户7143户，从业人数19584人。全部工业总产值1515万元，其中国营、集体仅占0.82%，手工业总产值655万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43.25%，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占了较大比重。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仅132.8万元。

1950年初，温州工商业面临严重困难，港口封锁、物价飞涨、市场萧条、工业凋敝，市区工业闭歇达108家。同年6月，温州市召开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以克服工商困难、维持和恢复生产为中心，调整公私关系，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随后，又多次组织物资交流，打开土特产滞销局面。1951年秋，工业形势逐渐好转，全市大多数地方产品，如纸伞、明矾、蜡纸、草席等，由滞销转为畅销。

为了迅速恢复工业生产，温州根据民国时期留下的工业基础，在体制变革上作文章。从1949年至1952年间，开始组建第一批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工业企业。1949年8月，由接管国民党县党部所属文化服务社造纸厂、浙瓯等

各报社的一部分器材所成立的温州蜡纸厂、新华印刷厂，是全市最早的2家国营工厂。

茶叶生产是温州地方优势产业。1950年，政府决定投资兴建第一家自建的温州茶厂。继而又集中运用救济失业基金，兴办了温州电化厂及纸伞、草席、毛巾、牙刷、麻袋、皮纸等厂，合称新中国成立初期十大国管工厂。

普华电气公司是民国时期留下的工业企业。1950年6月，普华电气公司首先实行公私合营，而后合营的有西山窑业厂、西山造纸厂、汇丰面粉厂、富华染织厂等5家。1949年秋第一家合作社——粗窰社成立后，1950年春，又相继成立染织社、纸伞社等，为市区最早的一批手工业合作社。至1952年，合作社已发展到25家。至此，市区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三种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50年的5.5%上升至1952年23.4%。

至1952年，全市（地区）工业总产值达8544万元，为1949年的1.33倍，其中市区3321万元，为1949年的2.19倍。3年恢复时期每年产值递增率高达26.1%。许多传统工业产品产量成倍增长，蜡纸为4.8倍、机制纸8.4倍、乳制品4.6倍、日用陶瓷0.8倍、纸伞10.6倍、算盘6.1

倍。轻重革棉布纸伞、草席、毛巾、算盘、锯材等产量除纸伞外，都已超过新中国成立前最高水平。

温州地区所辖的各县（除洞头外，洞头于1952年1月解放），也逐渐进入了工业恢复阶段。以乐清为例，1949年解放前夕，全县仅酿造、碾米、棉织等工业企业48家，职工469人。就是把城乡的铁、木、竹、砖、陶等手工作坊计算在内，也只有个体的匠作人员5000多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乐清工业有了很大发展。至1958年，乐清工业企业发展到344家，职工51880人，工业总产值3048万元，比1949年增长4.12倍。

从1949年5月至1952年底，党和政府注重从温州实际出发，在依靠人民的力量和各界人士的支持，调整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温州的工业经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二

从1953年开始至1957年，温州的工业进入第二个阶段，即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温州与全国各地一样展开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其中，工业建设方面的主要任务，一是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二是逐步建成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温州在执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国民经济运转良好。

这个时期，工业结构由私营企业向着公私合营转变。1955年底，市区公私合营企业由1952年的8家增至17家，产值由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5.6%上升为占14.36%；私营企业则由1952年的380家减为271家，产值由占48.2%降为占34.2%；手工业合作社（组）发展为166家，组织起来的人数已占39%，占全部手工业总产值的42.7%。

1956年春，全国掀起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市区私营工业185家，从业人员1138人，由个别合营发展到全行业合营；个体手工业4426户，8667人，绝大部分实行合作化。通过经济改组合并，到1956年底，市区的公私合营工厂和手工业合作社（组），分别为98家和260家。工业企业规模得到扩大，由1949年厂均14人增至109人。

手工业是温州的工业主体，是整个制造业的强项，大部分私营企业均以手工业产业为主。在这个时期，温州手工业的技术革新引发较大规模更新设备的热潮。棉织、皮革、蜡纸等业基本淘汰了手拉木机、人工磨皮、手工刨皮、捣浆等，实现了动力生产。温州市区内

的19个手工业社实现初步机械化、半机械化。温州的纸伞、草席、算盘业比较繁荣，经过机械化的改造后，成为解放初期温州手工业三大支柱产业。至1956年，纸伞年产量506.6万把，算盘产量73.2万只，草席产量56.6万条(1955年)。1956年全市(地区)工业产值达1.74亿元，为1952年8544万元的2.04倍，其中市区0.91亿元，为1952年的2.76倍。

温州下辖各县的工业，在这个阶段的也实现了全面发展。以平阳县为例：解放之初，平阳国营工业只有一家小型的发电厂，私营的纺织、酿酒、炼矾、食品加工等工业企业114家，职工2841人，工业总产值417万元(不变价)。此外，还有一批城乡家庭式小作坊和个体手工业者30372人。1950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业生产开始复苏。至1952年底，国营工业企业增至7家，私营工业企业149家，手工业生产合作社3家。产品产量均有所提高，其中明矾、发电、棉布、皮革、白酒等产量超过历史最好水平。年工业总产值2418万元，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增长78%。

1956年开始，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对79家私营工业企业改组合并为39家公私合营企业同时，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对2441户家庭式小作坊和个体手工业者组建成239个手工业合作社。至1957年，

全县工业企业286家(其中国营9家、公私合营38家)，固定资产原值102万元，职工总数6171人，工业总产值4043万元，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增长近2倍。

三

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我国进入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温州的工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之后，奠定了体制基础，继而进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这个时期大致为1957年1月至1966年4月，分为平稳发展、起落不平和经济调整3个阶段：

工业平稳发展阶段 1957年底，全面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温州地区实现工业总产值2.22亿元，为1952年的2.6倍；市区工业总产值1.18亿元，为1952年的3.55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由占21.1%升至30.68%。1957年底，市区有国营工厂73家、公私合营工厂71家、合作社268家，计职工4.65万人，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95.8%。

温州市区工业这个期间发展最快的是陶瓷、蜡纸和机制纸、乳制品等业，形成新中国成立初期温州轻工业特色。与1949年比，乳制品增49.7倍，机制纸增30.2倍，地、面砖分别增165.2倍与1675.2倍。

如，西山窑业厂成为全国50年代釉面砖主要生产基地之一和唯一出口基地。蜡纸年产91万筒，产量占全省56.3%。在全国四大名牌铁笔蜡纸中，温州“警钟”“三角”“灯塔”占其三。

经济起落不平阶段 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因忽视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在工业生产方面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大办地方工业，造成了高指标、高消耗、低效益，加上自1959年起连续3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温州经济严重受挫。

1958年3月，温州市召开第二届第三次人民代表会议，通过《温州市发展地方工业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提出重点发展陶瓷、化学丝绸、乳品罐头、水产加工及电力等工业，把温州建成完整、综合性轻工业城市。4月，开始“大跃进”运动，全党、全民大办工业，市区办起各类街道小厂、“辅助厂”343个，经过整顿合并为126家。继而，全面铺开工业基本建设摊子。

“二五”期间新扩建项目326个资达6981万元，占同期全部投资额73.15%，相当前八年工业基建投资额总和的8.7倍。投资额中，其中重工业占65.92%，100万元以上项目有电厂、动加厂、渔业机械厂、乳品罐头厂、水产联合加工厂等10家。

1958年4月，开始手工业并社、转厂及所有制升级。到1958年底，市区合作工厂由上年的1家增为36家，小型社组并为40个大社，26家集体所有制企业分别并入或升为全民所有制。由手工业者改业转为陶建、重工等业的有6100人。1958年底市区工业部门职工总人数猛增到9.54万人，为1957年的2.05倍。

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温州开展了“大办钢铁”运动，这个时期温州工业受到的波折比较严重。投入劳力10万多人，耗资上千万元，建土炉高炉2000多座，炼出的铁却不能造产品，财政亏损850万元。同期在金钟煤大搞煤炭（泥煤）开采，因效果不佳而关闭。

1960年，市区工厂开展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有1.6万人摆脱手工操作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水平由此前的33.7%提高到6%，使市区工业原以手工业为主状况逐步得到转变。其间，工业基础大为加强，但也带来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瞎指挥、高指标浮夸风等一系列问题。至1958年底，工业原材料全面紧张，市区的制碱制革原料及食盐、牛皮等供应不上，1959年起不得不缩短战线，精简职工，并关闭了温州钢铁厂等效益不佳的企业。

经济调整阶段 1961年9月16日，中共中央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发

布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进一步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先后停建、缓建了瓯江水电站、肉类冷藏厂等49个基本建设项目,市属全民工业企业由131家整编定点为86家,关停4家、并25家、转16家。

1959年至1962年,市区3次大规模精简职工3.9万人。将已升为全民所有制的东山陶瓷厂等51家厂,9689人,重新退回为集体所有制。恢复了断档停的缂纱、花竹、棕藤、元钉、铁锅等小商品生产,队2381人。同时,大力恢复织传统手工艺品出口。1962年,瓯绣、印花、草席雕塑、竹画帘等产品出口350多万元,工艺美术行业从新中国成立初的1200人增至2236人。

1963年起,工业部门进一步转上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试制成功支农新产品有塑料浮子脚踏结网机、吸河泥机、淀粉机等。通过调整,产品质量提高、成本下降、利润增加,经济效益明显好转。至1965年,市属全民工业企业主要产品的40项质量指标比1961年上升的有30项,占75%;亏损企业由11户减少为1户;产品成本年均下降7.96%;工业品手工业品宣布降价分别有57种和120种。这个时期温州市工业经历了发展、调整、提高的曲折过程。市区工业总产值

由1957年的1.18亿元,经过三年“大跃进”,1960年创3.91亿元最高峰,三年猛增2.31倍,1963年回落到2.01亿元的最低谷,1966年产值又回升到2.57亿元,9年间实际增长118%。

这时期的工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是电力、采掘、机械工业崛起。1959年至1965年,东屿电厂、百丈一级水电站相继建成,装机容量由4000千瓦增至3.7万千瓦。新扩建动力机厂冶炼厂、渔业机械厂、拖拉机厂、电机厂、矿山机械厂、锅炉厂等48个机械厂。原来的五金、铁器等手工业均已发展成机械工业。二是化学工业兴起,成为一个重要工业部门。1958年至1965年,化学工业投资3228万元,占同期全部工业投资的3.4%,居各行业之首。先后建成温化工厂合成氨、钾肥车间、有机化工厂、助剂厂、试剂厂、化学制药厂、催化剂厂等,固定资产增加65.1倍。温州始产化肥、农药、硫酸、盐酸、炭黑、苯酐、电石、有机玻璃、氧气等产品。三是陶瓷形成综合性基地。建成化学陶瓷、高压电瓷、耐火材料、日用陶瓷、面、地砖等系列生产厂,并组成有4389人的西山陶瓷工业公司。四是轻纺工业门类趋向齐全。新发展了毛纺、绸、麻纺、塑料制品、啤酒、香料、水产品加工等工业。温州始产毛线、白厂丝、纱、啤

酒、味精、平板玻璃等产品。五是传统手工业纸伞、算盘业则渐衰。纸伞、算盘从1957年的4107人产量487.7万把和921人、产量113.8万面，分别减为1961年的1047人、产量124万把和166人、产量30.8万面。

温州1963年—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成效显著。至1965年底，工业经济不

仅得到了全面恢复，而且完成了原定的“二五”计划中的生产建设目标。温州城市初步建立起了一个能基本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求的工业和手工业生产体系，且生产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也得到逐渐发展。

（作者单位：《温州市志》编辑部）

温州市鹿城城市信用社成立的 背景、过程与影响

◇ 陈建敏

1986年11月1日，温州市鹿城城市信用社（以下简称鹿城社）在未经人民银行批准的情况下开业，成为全国首家股份制城市信用社，即事实上的民营银行。这是温州改革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也是国家金融史上的重大事件。鹿城社是特殊时代背景下，企业家、地方政府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复杂博弈的结果。其戏剧性的出场，促成了股份制城市信用社的提前出现，也推动了中国城市信用社机构性质与行业规模的重大转变，具有重要的改革意义。

一、有利的时代背景

1984年10月，温州市有了第一家城市信用社——府前信用服务部。同年12月，瑞安县城镇信用服务部成立。1985年7月，温州市又同时成立了蒲鞋市信用服务部和大桥头信用服务部。4家信用服务部后来均更名为城市信用社。上述4家

城市信用社行政上隶属工商银行温州市支行或瑞安县支行，主要是为解决银行干部子女就业问题而创办。因此，这类城镇集体金融组织更像是人民银行与工商银行的家属企业，官办色彩浓厚，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有限。而1986年11月以后出现的、以鹿城社为代表的所谓“股份制城市信用社”，是由企业主们集资创办并自主经营的，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其间的开创性意义不可谓不大。

当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金融体制与经济新形势的矛盾愈发突出。到1986年，国家金融体制改革步伐明显加快。

1986年春，国务院体制改革方案领导小组金融组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1987—1988年金融体制改革的初步方案。1986年8月上旬，金融组在北戴河会议上向国务院领导汇报后，



当年位于信河街的鹿城城市信用社

形成《关于明后两年金融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这一原则性意见。这一文件就改善金融宏观控制、理顺利率体系、改革金融组织机构、有步骤地开放资金市场、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等五方面内容提出了改革设想。其中，就城市信用社的设想表述如下：“城市信用社要办成为城市集体企业和个体经济服务的金融机构，在自我发展的基础上，以自由联合、逐步发展成规模大小不同的股份制的城市合作银行。”这里出现了股份制的城市合作银行的概念，但还只是模糊的改革设想，需要逐步探索。文件结尾表示：“以上改革设想，明后两年大部分可以出台，但在具体实施上要稳妥、慎重。为了取得经验，先在部分地区按照上述设想，进行试点并加快步伐，以便为面上的改革提供经验。”

1986年8月18日至21日，第二次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座谈会在北京召

开。民营经济繁荣、民间金融活跃的温州市，被此次会议确定为第二批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之一。此前的5月份，为推动温州市成为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国务委员兼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率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专业银行行长到温州调研，历时8天。陈慕华一行的到访与第二次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座谈会的召开，极大地鼓舞了温州市各级党政干部、金融从业者与企业家的改革热情。

1986年9月30日，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同时向浙江省分行和温州市政府上报的《温州市金融体制改革试点方案》（落款时间为1986年9月18日），提到要“积极发展集体性质的城市信用社”，短期规划是“市区要根据业务需要积极增设城市信用社机构；同时允许经济发达的县城设立城市信用社”，长期规划是“城市信用社在自我发展的基础上，可以自由联合，组织大小不同的股份制的城市合作银行”。短期规划突破了《城市信用合作社管理暂行规定》（1986年7月12日）有关“县和县以下不得设立城市信用合作社”的规定，长期规划则基本照抄《关于明后两年金融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的有关表述。

上述时代背景，非常有利于股份制城市信用社的出现。但是真正迅速破土

而出，还需要民间力量的自发创举。鹿城社的主要发起人杨嘉兴、唐其强在一份写给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的题为《筹备民间金融组织的经过与认识》的检讨材料（1986年12月）中写道：“今年上半年以来，我们陆续听到了一些金融体制改革的消息，觉得原来的打算，政策是允许的，方向是对头的，于是便下决心进行了筹备”。可见，鹿城社的出现，正是当时倡导金融体制改革的时代大背景和民间极力想在金融领域有所作为的两股力量合流的结果。

二、成立过程一波三折

当时，杨嘉兴是街道企业温州环

南机电设备厂的负责人。根据杨嘉兴的自述，他最早是在1984年向银行申请贷款受挫后，萌生了办“民间银行”的想法。之后两年，这一想法不断成熟，并得到鹿城区委书记王思爱的支持。1986年6月，杨嘉兴等人曾向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领导咨询“办银行”的政策问题，得到了“目前国家不允许私人办银行”的明确答复。

但这事并未就此作罢，杨嘉兴等人试图绕过人民银行，得到工商部门的“特批”。经多方联络筹集到31.8万元资本金后，于10月15日领到鹿城区工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温鹿工商临字第821号）。于是，他们筹备“鹿城金融服务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旧址（泰顺白柯垵村）

社”于11月1日开业，并开始营造舆论环境。鹿城社的发起人中有一名是侨眷，正是通过这种关系，他们向日本、中国香港等地有关人士和单位发出了鹿城社将于11月1日开业的通知，收到了大量的贺信、贺电与锦旗。1986年10月27日，杨嘉兴等人向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递交了创办鹿城社的书面申请。这与其说是申请，还不如说是通知。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于10月28日、31日两次派员到位于信河街272号的鹿城社营业场，要求暂缓开业，“否则的话，后果自负”。

一边是触犯金融法规，一边是失信于社会各界，杨嘉兴等人感到骑虎难下，左右为难。于是，杨嘉兴决定寻求更高一级官员的支持，他要找的就是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在温州的改革开放史上，董朝才以思想开明、锐意改革而著称。根据杨嘉兴多年以后的深情回忆——《董书记圆我金融梦》（2008年5月），董朝才书记热情地接待了他，耐心地听完了他50多分钟的汇报，最后明确表态：“温州的金融体制改革，就让你先来试点！”事后，董朝才向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相关领导施压，要求“先试试看看”。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夹在温州市委与上级行之间，左右为难、压力很大。

1986年11月1日，鹿城社如期开

业。据杨嘉兴回忆，“开业那天，温州市民成群结队到我们的信用社排队存款。队伍有几百米之长，一直排到嘉会里巷，当天就吸收存款30多万元”。这可能有刻意营造鹿城社受欢迎的安排，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主与民众对当时金融服务的供求矛盾。

在温州市成为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后，“积极发展集体性质的城市信用社”的议论，让温州的企业家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们敏锐地注意到“积极发展”的提法，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集体性质”的限定。事实上，1986年9月至10月，温州华建公司陈良谟等人（9月24日）、温州东风家具厂苏方中等人（9月27日）、温州电焊设备总厂黄国华等人（10月4日），都先于杨嘉兴等人向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递交了开办城市信用社的书面申请。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也于1986年10月中下旬先后将这些申请转报省分行。在报告中，这些机构被温州市分行称为“股份制的民间集体金融组织”，以在名称上进行调和。但民间创办城市信用社未有先例，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显然还需要时间“研究决定”，这可能会是漫长的等待。如果不是鹿城社的擅自开业，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会不会批设以及何时批设这类机构，都是未知数。因为，就在一个多月前（1986

年9月25日), 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在转发总行《城市信用合作社管理暂行规定》(简称《规定》)时, 就提出以下意见: “《规定》公布之后各地组建的城市信用社合作社, 由人民银行领导和管理, 并在人民银行开户……按照各地不同条件, 也可以由当地人民银行委托工商银行组建和管理, 在工商银行开户, 暂向工商银行交存款准备金, 行政上归街道或当地政府领导。”可见, 人民银行要增设的依然是“官办”城市信用社, 这和民间的理解出入很大。

就在鹿城社开业6天后(11月7日), 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快速作出反应, 同时批复设立了东风城市信用社、华建城市信用社。东风社在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作出批复的当天就举办了开业仪式。东风社因此成为首家经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股份制城市信用社, 后来鹿城社和东风社一直在为“谁是第一家股份制银行机构”而打笔墨官司。11月9日, 《人民日报》刊出《温州出现“合股银行”》一文, 称“我国城市首次出现两家民间性质的‘合股银行’”, 对鹿城社与东风社的服务宗旨、经营特点、浮动利率与营业时间等作了介绍。

因此, 1986年11月的第一周, 是股份制城市信用社能否获得合法性的关键时段。可以想象, 在这一周时间里,

浙江省内的人民银行系统要承受多少来自社会各界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压力。其间, 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作出了及时而恰当的反应, 促使股份制城市信用社合法化并在浙江省内率先发展。

但是, 至此, 鹿城社依然是未经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非法金融机构, 人民银行如不摆出整肃的姿态, 金融法规的严肃性将受到挑战。1986年11月27日, 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向各专业银行发出《关于“鹿城金融服务社”未经批准, 各银行不得予以开户的通知》。与此同时, 责令鹿城社作出书面检查。12月3日, 杨嘉兴和唐其强提交了书面检查, 其中检讨道: “我们几个区街企业负责人, 对于办企业积累了一些经验, 但对创办民间银行都是门外汉。所以在筹办过程中, 没有对照《条例》要求, 急于求成。”12月10日, 鹿城区政府致函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 认为鹿城社“于11月1日正式开展金融经营业务, 至今已储入资金逾六百万元, 贷出逾五百万元, 与五千多户客户发生了业务关系, 在国内外报刊上屡有报道。该社一些不妥善的地方应在内部加以正确的指导,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12月15日, 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同意“鹿城金融服务社”补办报批手续, 并向省分行提交了《关于报批温州市鹿城区金融服务社报

告》。12月31日，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批复同意设立温州市鹿城城市信用社，鹿城社的合法性问题得到解决。

在鹿城社成立过程中，还出现了两家机构争夺“鹿城”牌的插曲。1986年10月14日，黄国华、张爱春等人向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提交了《关于创办鹿城金融服务部的申请报告》，“鹿城金融服务部”的名称与杨嘉兴等人要创办的“鹿城金融服务社”仅一字之差。10月22日，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向省分行上报了《关于报批温州市鹿城金融服务部的报告》。而杨嘉兴等人则在5天后才向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提交书面申请。11月，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一度电传章程，将黄国华等人要创办的社定名为“温州市鹿城城市信用社”。12月10日，鹿城区政府致函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认为杨嘉兴的鹿城社已开展金融活动且名声在外，不宜更名，建议黄国华等人的社冠名“东瓯”。12月30日，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采纳了鹿城区政府的建议，批复同意设立温州市东瓯城市信用社。为名称之争，黄国华等人于1987年1月7日致函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将‘鹿城城市信用合作社’改为东瓯城市信用合作社’，我们以为以‘东瓯’取名，不利于经营业务开展，为此，我们研究暂不办这个信用社”。当然，这只



刘锡荣（中）、高忠勋到信用社听取杨嘉兴（左）的汇报

是一时置气，毕竟是好不容易到手的金融牌照。

三、成为温州的改革典型

对城市信用社的发展规划，人民银行曾设想，先增设集体性质的城市信用社；然后在自我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自由联合转型为“股份制的城市合作银行”。当然，这里所谓“股份制”的意思并不明确，也未必等同于温州市后来出现的“股份制”。

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在《关于鹿城区城市信用合作社发展情况的调查报告》（1995年4月）中指出：“……开户难、存贷款难、结算难的矛盾，十分突出。城市信用社正是在温州商品经济特殊格局的特定条件下孕育和诞生的。”说明当时出现股份制城市信用社并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可以这么说，即使没有鹿城社的突破，股份制城市信用社迟



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股票、股票存根和章程

早也会出现，但可能要晚一两年。杨嘉兴等人的大胆突破，促成了股份制城市信用社的提前出现，也推动了中国城市信用社机构性质与行业规模的重大转变，具有重要的改革意义。

1986年以前，温州市只有4家隶属工商银行的城市信用社，全国有同类机构约1300家。股份制城市信用社大量出现后，到1989年末，温州市的城市信用社数量增至26家，全国则猛增至3330家。至此，股份制城市信用社在中国成为一股不容小觑的金融势力。1989年，工商银行温州市分行下属的府前社、蒲鞋市社和大桥头社分别成立了董事会，向股份制转型。

鹿城社很快被塑造为温州的改革典

型，受到社会各界的特别关注。据《温州市鹿城城市信用社一九八七年工作总结》，鹿城社成立一年多的时间里，领导、学者、记者来社考察、参观、采访的多达1000余人次，其中就有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国家计经委副主任李瑞珊、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张五常、国家经济信息中心总设计师乌家培、广州市市长朱森林、中日技术交流协会会长潘宝吉、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马珍、奥地利记者欧普雷等。后来，还有《纽约时报》记者爱德华·加根来鹿城社采访，并在1988年8月5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了题为《温州人办起中国首家私营银行》的报道。

1987年10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批准，鹿城社、东风社先后向社会增资扩股，发行股票8.2万元和10万元。鹿城社与东风社成了全市城市信用社的领头羊。随着鹿城社影响力的扩大，杨嘉兴也得到了全市金融界的高度认可。1987年12月20日，温州市城市信用合作社协会成立，杨嘉兴当选为理事长。

（作者单位：《温州市志》编辑部）

浙闽边区女性对红军挺进师革命活动的支持

◇ 谭桂涛 夏艺洵

【浙闽边区是一块有着深厚红色文化底蕴的土地。1935年—1938年，红军挺进师能够在浙闽边区多次粉碎国民党军队“围剿”，使红旗屹立不倒，离不开包括女性群众在内的广大群众的支持。浙闽边女性通过传递情报、照顾红军伤病员、掩护红军战士、提供后勤保障、直接参军参战等方式，支持红军挺进师的革命活动。她们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如爱国爱乡精神、奉献牺牲精神、乐观主义精神等，成为区域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传承与发扬。】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领导革命军队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建立了一系列农村革命根据地，使星星之火发展成为燎原之势。其中，浙闽边区（包括今泰顺、平阳、福鼎等地）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1935年—1938年，红军挺进师在浙闽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发动土地革命，创建游击根据地，并多次粉碎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挺进师能够在边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在敌军“围剿”中克敌制胜，使游击根据地坚如磐石，使红旗屹立不倒，离不开边区人民群众的大

力支持。学术界对红军挺进师与群众关系这一问题做出了长期探索，形成深刻的认识，但专门聚焦女性的考察，迄今依然相对薄弱。本文拟以边区女性为视阈，探究她们对红军挺进师革命活动的支持。

一、浙闽边区女性支持红军挺进师革命活动的方式

红军挺进师与浙闽边区人民形成了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可谓军民鱼水一家亲。在红军的革命精神感召下，群众思想觉悟迅速提高，形成了

踊跃参军参战的热烈局面。在这样的革命浪潮下，边区女性不爱红装爱武装，巾帼不让须眉，有的直接参军参战，奋战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例如，1936年10月，刘英率挺进师战士在泰顺富垟地区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信念如钢、英勇无畏、战术精妙的红军打得敌人抱头鼠窜、溃不成军。接着，红军开展追击。此时，当地人民群众也和红军战士一起追捕敌人。有一名妇女还勇敢地抓获俘虏一名，并缴获其枪支，革命豪情与英勇气概令人赞叹。除直接参战外，边区女性还通过以下方式积极支持红军挺进师的革命活动：

（一）传递情报。战争年代，情报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准确、完整、及时的情报，能够帮助部队了解形势、把握战机、制定策略。边区广大交通员是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交通员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女性。

她们外表柔弱，相对于男性而言，更容易被国民党忽视、隐蔽性更强。例如，福鼎山门底交通员吴三妹经常到岭头竹仔山一带为红军送信。机智的她将信件缝在双层鞋底中，或者藏在自己头发中。遇到敌人盘问，她就说是走亲戚，敌人对看似柔弱的她放松警惕。因此，她一次次顺利完成任务。广大女性交通员外柔内刚，其意志之坚定，较之

男性亦毫不逊色。例如，泰顺南院乡棠坪村的刘素贞女士，早在1934年就以摆渡为掩护，为红军默默传递情报，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红军挺进师到达泰顺后，她继续为红军情报工作服务。后来，她不被国民党抓去审问，任凭敌人如何迫害，她始终铁骨铮铮、视死如归。最终，她被残酷杀害，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

及时、准确的情报，有时候能够挽救众多战士的生命。1936年11月，平阳南宋地区的反动力量到牛角湾“围剿”。地下交通员李先花得知该消息，立刻争分夺秒赶往牛角湾，给红军报信，使大家及时转移，避免了大的损失。保持与加强地方党组织和中央的联系，也离不开情报工作。1936年9月，刘英、粟裕要求派人尽快把刘英密写给党中央的报告，送达上海地下党，进而转陕北党中央。这关系到红军挺进师与党中央的联系，意义重大。组织将任务交



红军山洞医院（泰顺峰文双溪口村）

给平阳女性林心平。年仅17岁的她翻越崇山峻岭，到达温州，并进一步到达上海，顺利完成任务。

（二）照顾红军伤病员。边区女性将红军伤病员视为亲人，用真挚、细腻的心，关爱、照顾他们，使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

1937年峰文大战后，30余名红军因伤势严重，难以跟随部队转移。根据刘英的安排，他们在泰顺双溪口及附近的山洞中养伤。照顾红军伤病员的任务落在了附近群众的肩上。广大女性不辞劳苦，参加救治与照顾。许多女性上山采草药。泰顺青皮坳村的妇救会会员吴细媚看到红军伤病员失血过多导致生命垂危而营养却跟不上，毅然将自己的奶水接到碗里，喂给伤病员，宁可让自己需要吃奶的女儿靠粗粮来度日，其革命之爱令人感动。泰顺隔后村柯老太太（柯其森的母亲，具体姓名不详）坚持为红军伤员做饭，使他们身体逐渐康复。她被敌人毒打之后，生命垂危，还忍着伤痛，给伤员做了最后一锅饭。内寮村卢立诚的母亲、吴尔发的母亲（具体姓名不详）轮流照顾一位伤员数月，直到身体恢复。双溪口村支部书记黄明星的妻子卢桂莲也积极参与救治工作。敌人把她绑走、严刑逼供，将她打得伤痕累累、多次昏厥，但她不吐露一个字。

做饭、喂饭、疗伤等照顾伤病员的工作，女性比男性擅长，浙闽边女性在这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红军挺进师转战各地，经历多次大小战斗，有的战士受伤或致病。但是，有着包括女性在内的边区群众的照顾，他们得以尽快康复，重返战斗岗位。

（三）掩护红军挺进师战士。红军挺进师能成功开展游击战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深厚的群众基础。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红军战士随时可以化整为零，使敌人寻找不到。浙闽边区群众一次次成功掩护红军，其中也有广大女性的功劳。

在掩护红军的工作中，浙闽边区女性展现出自己机智的头脑。有一次，红军女战士、党员蔡爱凤在福鼎山门底妇女董阿菊家里用餐，敌人突然进村搜查。此时，蔡爱凤很难转移出去，形势很危急。董阿菊急中生智，请来很多同村妇女一起拧苕麻，宣称蔡爱凤是自己表妹，并让她一起参与劳动。敌人没有看出破绽，就悻悻离开了。1937年6月，林辉山等10余位革命骨干在山门底吴三妹家里休息，敌人突然进军“搜剿”。吴三妹急忙打开家中顶楼上一个暗仓，让同志们躲进去，并机智应对搜捕的敌人，使同志们度过危险。

有的女性，还为了掩护红军挺进师

战士而献出生命。红军女战士蔡爱凤在高滩村从事革命活动时，被福鼎县的特务侦查得知。敌人突然包围了村子，并进入家户搜查。高滩村妇女金维娇将蔡爱凤藏起来，但没来得及将蔡爱凤带来的宣传标语藏起来。敌人抓不到爱凤，看到了宣传标语，就将金维娇等人押走审问。任凭敌人严刑拷打，金维娇等人都不说出任何秘密。残暴的敌人竟将怀孕六七个月的金维娇一刀刀地割死，其他几位革命群众也英勇就义。但是，敌人的严刑拷打无法动摇进步女性的革命热忱。

（四）提供后勤保障。浙闽边女性积极参与提供后勤保障的工作，使挺进师战士无后顾之忧，可以安心作战。她们勤劳能干、心灵手巧，在这些工作上有着男性难以替代的优势。

平阳五岱山八亩后村有7名女性经常一起开展革命活动。因为她们名字中都有“英”字，被当地人民称为“七英会”。下宅村有10名革命女性，名字中都有个“花”字，被称为“十枝花”。在革命感召下，她们站岗放哨、为红军缝洗衣服、制作干粮袋、帮助红军购买米和柴等，极大地便利红军的生活。1936年8月，浙闽边临时省委第十次扩大会议在泰顺李家村召开。因开会人员达数百人，急需挖井供应饮水用水。在红

军挖井时，李家村李春香、庄其掌妻子（具体姓名不详）等八位女性给战士们送来茶水，并帮忙挖井。这口水井既是军民一家亲的劳动结晶，也是边区妇女革命贡献的见证。1937年1月红军在牛角湾一带宿营时，当地畲族妇女送来饭食、茶水，做好后勤保障，使红军战士倍感温暖。1938年红军挺进师要北上抗日，平阳女性郑明德发动妇女，为战士们赶做军鞋400多双。

二、浙闽边区女性在革命活动中体现的宝贵精神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浙闽边区女性以行动诠释信念，以奉献书写忠诚，不仅有效支持了红军挺进师的革命活动，助推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创建，而且体现了宝贵的精神，成为区域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依然熠熠生辉。她们的宝贵精神至少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爱国爱乡精神。她们热爱历史悠久、文化璀璨的伟大祖国，热爱浙闽边区这块风景如画、世代居住的土地，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在浙南实行黑暗统治，土豪劣绅也盘剥压榨百姓。为了使祖国和家乡有更加美好的明天，她们尽自己所能，积极支持红军挺进师这支人民子弟兵。



刘素贞母子四英烈纪念碑（位于泰顺南院棠坪村）

奉献牺牲精神。当时，支持挺进师是受到国民党地方当局极力打压的，甚至会有生命危险。但是，她们为子弟兵提供后期保障、照顾其生活、传递情报，出力出物，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她们无私奉献、默默付出，将汗水、心血甚至生命献给革命事业。

乐观主义精神。大革命失败后的浙南地区，革命形势很严峻，暂时处于低潮期。但浙闽边进步女性怀着革命必胜

的信念，带着乐观主义精神，积极参与革命活动，推动革命形势不断发展。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今天，国家和社会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浙南人民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程中阔步前进。但浙闽边女性的革命精神不仅不会褪色，而且如陈酿美酒、历久弥香。弘扬这种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能够为加快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多精神动力。

（作者单位：泰顺中学）

参考文献：

- 1.《浙闽边区革命斗争史话》：王汝亮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 2.《红军挺进师在泰顺》：刘建国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
- 3.《泰顺革命亲历记》：中共泰顺县委党史研究室，1995年内部编印。
- 4.《红军挺进师与浙南游击区》：，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 5.《中共泰顺历史》（第1卷）：中共泰顺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记录温州金融历史 谱写改革开放华章

——《温州金融志（1978—2015）》编纂经验谈

◇ 陈明衡

《温州金融志（1978—2015）》，于2016年4月启动，至2019年7月完稿，2020年1月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该志书结构合理、详略匀当，文字清通、可读性强，资料丰富详实。全书136万字，收集411组图片、整理164张表格，涉及可检索人物847人、主题917条，反映了温州金融各历史阶段的重要事件，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进一步挖掘研究的空间。

—

1978—2015年的温州金融，就历史的丰富性、戏剧性而言，可能很难找到另一个可匹敌的案例。在短短30多年内，一个无依傍、无资源的沿海边陲城市，经济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金融也历经了浓缩百年的更新迭代。从前现代的合会、典当，到最现代的资本市场、互联网金融；从计划经济下的国家



金融会计，到发挥资源配置核心作用、成为第三产业主力的市场化金融。西方世界几百年的金融变迁、经济体制的巨大转轨、全国范围的领风气之先，一时浓缩在温州这座小小的三线城市，赞誉有之、颠仆有之，也注定了这部志书的丰富性。

回顾30多年的历史，温州金融的关键特征是它的二元结构（国家金融与民间金融并存）或者说三元结构（再加集体金融即城乡信用社等），突出特色在民间金融。当然，国家正规金融是主轴、是基本面，且与民间金融有千丝万

缕关系，并在与其互动的过程中展开了一波又一波改革。体现在志书结构上，前三篇金融管理、金融机构、金融业务，主要记叙国家正规金融的基本面；后两篇分别记叙金融改革和民间金融，突出了温州金融的特色和亮点，最后一篇是文献与人物。这种结构编排固然有志书体例的需要，整体上也较好地体现了温州金融的二元结构特征。

第三篇《金融业务》篇幅最长。编纂中，我们坚持突出地方特点的原则，全国一致的业务略写，温州特色的业务详写。贷款业务中专列了中小企业贷款、私营及个体贷款，例举了农房抵押贷款等产品，梳理了贷款风险管理和信贷资产质量的变化脉络。2000年以前温州的结算业务颇有创新与特色，有温州市银行汇票，城市信用社的通汇业务、服务个私经济的结算和跨区域汇款，温州模式的金卡工程等。现金业务一节，记载了各种涉现金的案件与事故。外汇业务的亮点是民间外汇交易市场。银行服务一节，记叙了网点服务、信贷服务、农村金融服务等方面温州超前或特有的做法，很多做法开风气之先。保险业务上，特别关注了贷款保证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洪水责任划线承保、理赔案例等。证券期货业务上，记叙了20世纪80年代的股票债券发行、场外证券

交易，梳理了90年代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审批的企业债券发行情况，专记了温信基金、金信信托兑付风波等。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金融改革的帷幕是温州拉开的，即1980年开始的利率浮动。第四篇《金融改革》，依次记叙1986年金融体制改革试点、2002年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2012年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等。这3次改革都是由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负责人发起或牵头，都是基层需求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产物，不仅有温州先发意义，也有全国金融体制寻求突破的意图。全部归结为六章的温州金融改革，基本逻辑大体上都是金融体系受到市场冲击，基层自发试点突破，得到认可与规范，但很快又失去创新性和适应性。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纵观历次改革的进展，很难说实现了初始的目标；但不管直接成果如何，改革于当时都有提振信心、承认创新、推动探索的作用，后人也可以从记叙中读出当时温州乃至全国金融领域的关切焦点。

“两社一会”（城市信用社、金融服务社、农村合作基金会）是特别用心编纂的一章。这些机构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是温州金融市场上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褒贬不一；但白云苍狗，现在都已成为历史。这次整理，我们挖掘

了很多原始资料，包括文件档案、口述回忆等，应该是目前最全面、最完整的公开出版资料。尤其是我们整理了全部51家城市信用社准入退出变化情况，1999年—2000年并入农村信用社的148家农村合作基金会基本情况等，都是采铜于山、前人未有的工作。我们以专记的形式，分析了全国首家股份制城市信用社——温州市鹿城城市信用社成立的背景、过程与影响，揭示了民间力量是如何推进和加快改革进程的。我们以永嘉县瓯北城市信用社为案例，记叙了城市信用社退出市场的曲折过程，逐一说明政策变化，不是就个案讲个案，而是希望由点及面，反映当时的金融管制及市场反应。我们如实记录了泰顺金鑫城市信用社等风险案例，家族经营、违法违规，触目惊心。我们还以《农村合作基金会》一节及附录的文件，真实再现了当时地方政府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的冲突与协作。

第五篇《民间金融》中，记录了从1984年到2015年发生在温州农村的一共10次民间会案，其详细全面程度也是前所未见的。批阅原始资料，这些会案的记载往往骇人听闻，不仅集资金额巨大、范围广泛，会案爆发后常常有上访、静坐，还有械斗、绑架、私刑等，反映出来的人的贪婪、残暴、绝望，不

能不令人警醒。披卷沉思，就在金融这个没有硝烟的领域，30多年来，有多少悲欢，乃至多少人命陨歿其中。从早期的会案，到2011年金融风波，都不乏有人被逼迫自杀的，也有人被判处刑罚的，凡此种种，后人能不鉴哉。我们首次整理公开2003年—2015年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监测的连续13年民间借贷利率，每月300—400笔，分多种维度汇总列出，是目前国内仅见的如此庞大的民间借贷利率数据库。对这个主题感兴趣、做计量研究的学者不可错过。

我们用30多页的篇幅，记叙2011年爆发的温州金融风波。这次风波成因积淀深厚，后果影响广远，发展蔓延的周期与修志时间相续，我们有责任尽己所能写到位，为后代留下信史，用作鉴戒。全章记叙按照“风险积累、爆发、扩散、处置”的顺序展开，史料选择汰渍存精，记载具体有据。关于风波成因，我们发现了产业发展减速、房地产投资热、信贷顺周期扩张、民间金融异化等因素，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一旦环境与政策变化，加上最后一根稻草，风波随即爆发。风波冲击影响深刻广远，需要反思地方产业、房地产、银行信贷模式、担保链、信用建设以及危机处置模式等等。这部志书截止在这场风波上，既是偶合，也是冥冥之中与有深

意。因为，这场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交织的风波，正标志着以二元结构、民间金融为特征的温州金融格局开始淡出历史舞台。今后，可能再没有如此戏剧性的地方金融历史；“温州金融”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可能越来越不淡化了。

志书主体，记叙至2015年，但为了反映最新的发展变化和未来趋势，有些内容一直延续到志书编纂的当下。例如，《银行业务》中记叙了在普通存款基础上嵌入金融衍生品的结构性存款，有别于传统贷款业务的类信贷资产业务等，这些基本上是2010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还记叙了第三方支付、手机银行、金融微信平台、网络贷款等互联网金融的新事物。2016年4月开始的互联网金融领域专项整治是近年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项重点工作，我们特辟一专记，记叙温州的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及案例。更重要的是，2011年爆发的温州区域金融风波并没有在2015年停歇，2012年启动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也没有在2015年止步，书中都作了适当的延叙。

“存在就是存在于铅字上，其余一切终将沦为虚无”——这固然是印刷术文明时代的偏见，但我希望，这部志书庶几把温州金融这段历史的精髓记录下来，人们能够从这部志书中略约读出温

州金融这段历史的梗概。

二

这部志书的编纂过程中，我们有一个自觉、明确的取向：既要面向温州金融界，把30多年的成绩、经验、问题、教训呈现出来；又要面向学术界，为学术研究提供尽可能全面、系统、真实、可靠的温州金融史料，以期与学术界形成良好的互动，推进温州金融的学术研究，并为温州金融的继续发展“借脑”。因此，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收录一些负面史实，记叙一些有争议的人物和事件。要使一部地方性专业志书具有全局意义，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要有这样的意识和心气。编纂过程中，我们坚持参照系应该具备全局性，把整个国家的金融改革发展作为叙述的背景和参照；而温州金融是叙述的着眼点，是深入个案研究的对象。因此，温州金融与全国其他地方有别之处、独特之点、先发之端，记叙较详，特别是较大篇幅记叙了金融改革、民间金融等。

鉴于内容需要，我们没有完全被传统志书的体例匡限住，而是做了一些“出格”的突破，揉合志和史的写法，增加了史的记叙。“体例创新”不敢

当，但原则是形式服从于内容，既然这样可以保存更多史料、可以更好记叙大家关切的温州金融特色的内容，那就大胆地这样写。也正是由于史志融合的写法，有很多史实不免多处都要写到。大的如国有银行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小的如2011年金融风波前后一些非法集资案等等。对此，我们尽量详略有别，角度分殊，落笔裁剪多加斟酌。“考殿最于锱铢，定去留于毫芒”是我们的理想，虽不能至，勉力为之。我们还用心制作了4套索引，以便读者对照查阅。

志书是编纂不是撰著，应该尽量“述而不作”，多做史料的整理编录，少予臧否评论，更忌臆想推断、蹈空发挥。因此，资料搜集和甄别在志书编纂中特别重要。本书主要资料来源，除了撰写人员分工提供部分初稿之外，大量是依靠我们编务人员爬梳原始档案，逐步积累而得。我们调阅了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部档案资料，搜索了温州市档案馆的金融档案，查阅了《温州日报》上温州金融报道的电子版，还访问了乐清市档案馆、温州市委党校图书馆、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金融机构档案和行（司）史馆、展览室等。我们把温州市金融学会的《温州金融》杂志、温州市银行业协会、保险业协会、证券期货业协会的内部刊物

等一一梳理过，摘录有价值史料。此外，我们也搜集参考了大量关于温州金融的图书资料、论文和报道，这些都编目在志书第六篇第一章，内容也在编纂过程中拣选录用。历史学家傅斯年先生说“史料即史学”，主张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三年多来，我们正是依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开展编纂工作的。

搜集甄别资料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心得是：志书编纂也好，学术研究也罢，一定要重视第一手资料的整理和利用。如果说我们有可以自诩的成绩，那就是挖掘了一批温州金融改革发展史上的一手资料，尽量公开出来，供大家参考。本书中，写得扎实、有血有肉的，都是一手史料充分、梳理得当的部分。而翻阅现有关于温州金融的专著、文章，发现不少是基于二手资料，陈陈相袭，人云亦云，面目似曾相识，价值大打折扣；乃至以讹传讹，偏差和错误在在皆是。这里再引一句傅斯年先生的话：“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希望本志书有利于这种进步。

对于前人多有提及的温州金融史实，我们尽量收录一手原始的资料、具体确凿的素材。例如，温州自发启动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我们依靠当事人陈礼

铨的自述材料，记叙了金乡农村信用社率先试点的起步、顾虑、争论、周折以及地方官员的支持。我们收录了1989年国家法定利率与批准的温州试行利率的对比表，使历史记载变得更加丰满。又如“方兴钱庄”这个谈论温州金融绕不过去的话题，我们收录了方培林的自述和1984年12月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的专题调查报告，不仅详述了事实，也反映了各方态度。

编纂过程中，我们认真爬梳甄别史料，做了一些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工作。例如，第三篇《扩权外汇与温州机场建设》专记，发前人未发之覆，改写了温州机场建设筹资的历史叙事。关于温州机场建设的资金来源问题，一直以来的说法是“温州自筹地方资金建造了全国第一座地方集资为主的机场”。实际上，温州机场建设的一半资金来源，既不是国家拨款或贷款，也不是民间自愿集资或者摊派，而是温州政府利用国家拨给开放城市的扩权外汇，向用汇企业收取“用汇效益专款”，解决机场建设的资金难题。

在 firsthand 资料中，最重要的又应当是档案馆藏文件资料。把前人的著述作为史料来使用，不仅不能贡献新史料，还容易陷入前人构建出来的种种叙事逻辑和陈词滥调中。如果再据此发挥或者

引入“新理论”阐释，就会充满想象、误解和不着边际的大话套话，难以反映历史真实。而文件档案，特别是处理具体事务、出台具体措施的原始文件，常常具有很强的历史真实性，透露出丰富的历史信息，大概是顾炎武所谓“采铜于山”的铜矿了（总结性、报告性文件难免有溢美之词，可能稍逊一筹，要仔细甄别）。

这里要提醒从学术研究角度查阅这部志书的读者：如果要更上一层研究温州金融，还请尽量从搜寻整理第一手资料入手，挖掘原始资料特别是档案资料，“匪惟摭华，乃寻厥根”，把史料工作做扎实，真正有益于历史事实的披露、前人成败的鉴戒和知识学问的积累。这部志书囿于编者的水平、志书的体例和编纂的时限，在搜集、处理史料上还做得非常不够；上述“心得”云云，可能正是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薄弱环节。它只是聊发其端，如果能够为研究温州金融现象的学者提供一些初步的信息、一条深入的门径，或者，一组批评讨论的话头、一个交流的平台，我们就算达到目的了。

另一点提醒是：按照后现代史学的观点，“历史是一种建构的东西”，根本没有纯粹客观的、不受任何观念影响的历史叙事。这部志书虽说有体例的



约束与匡正，虽说秉持“史料即史学”的观点，但也不避免人为、先验的观念预设。举其大端，我们接受了这一时期的温州金融特征是二元结构或三元结构的意见，在记叙的详略、史料的拣选上有倾向性；我们在民间金融等叙事中暗含了黑格尔最早提出的历史事物必定经历“生长、鼎盛、衰亡”过程的有机发展观；我们简单地以1978年为记叙的起点，但很多现象并不能以此为界而泾渭分明（例如合会）。凡此种种，既不能悉予避免，就坦白告诉读者，请从学术研究角度查阅此书的读者体察、甄别和批判。同时要与后之研究者共勉的是：我们不仅不应搬字过纸、人云亦云，还要对自己的叙事范式、潜在理论有清醒

认识，乃至有反思能力，惟其如此，才可谓“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

书中错误、纰漏、瑕疵一定还有很多。直到书稿交付出版社排版之后，我还不断发现大小错误，不断申请增删修改，真是校书如扫叶，未有穷尽时。大致想来，会有五种错讹情形：一是事实记叙错误，乃至前后矛盾；二是重要史实遗漏、记录不全；三是详略失序、本末倒置；四是陈述肤浅、评论失据；五是文字及编排错讹。这些问题都必须由我这个主编承担责任。临深履薄，不禁惶恐；回头检视，愈感心虚。真诚祈望读者批评指正，也希望明眼之人不要把本志书的记叙都视为“定论”。

（作者单位：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

“小小”故事映初心（主题）

◇ 李 艺

这是一个长达81年的故事，这是一个有关信仰和使命的故事。这个故事，被温州铭记，也将被历史铭记——

瞒着父母，18名平均年龄16岁的上海青少年结伴离家来到温州，他们给自己这个集体取名为“上海小小流动剧团”。在温州市区中山公园内的中山纪念堂住下后，他们开始连续3个月奔忙在温州市内和乡村演出戏剧。这事在温州成了新闻，温州各家报刊争相对这个剧团追踪报道，在报道中称其为“小小”……

81年的光阴倏忽而过，当60多岁的张岱和余晓晨2019年专程从北京赶到温州市图书馆期刊资料室，通过查阅1938年4月到7月期间出版的《浙瓯日报》《温州日报》《游击》《生线》，了解到诸多“小小”在温州演出革命戏剧宣传抗日救亡的细节之时，她们感到心脏加速了跳动。作为“小小”的孩子，为

这一刻的到来，她们已经寻觅太久。

“1938年，这群生长在当时中国最繁华都市的青少年，在炮火中决绝地奔赴贫困之地延安，只因那里是中国革命的耀眼灯塔。温州是他们这次冒险途中停留的首站，也是停留时间最长的一站。父母曾简单说起过往事，如今我们在温州第一次看到确凿的历史资料与他们的口述互相印证，心中只有激动和震撼！”张岱是“小小”副团长张建珍的女儿，余晓晨是“小小”成员余康的女儿。

此番来温之前，她俩和其他几十位“小小”的孩子们，有一个共同的遗憾：“1936年就参加革命的‘小小’成员们，在长期战斗中经受了考验，他们一生有着各种艰难，但始终没有忘记当初出发去延安的初心，在各条战线上为祖国尽职尽责。如今他们大部分人都走了，我们下一代却不太清楚这些往



事。”为了让“小小”的革命故事和精神流传下去，这些“小小”的孩子们决定为“小小”著书立传。近两年来，他们一直在努力寻找有关“小小”的历史记载，也去延安找过，但一直未能在国内出版的所有戏剧史中发现“小小”的踪迹。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2019年夏天，他们终于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发现——在温州著名戏剧文化学者、原温州市图书馆地方文献部主任陈寿楠编撰的内部资料《温州进步戏剧史料集》中，罕见地记录了不少“小小”在温州的踪迹。

于是，张岱和余晓晨作为“小小”的子女代表，火速通过温州市图书馆找到陈寿楠先生，在90岁高龄的陈寿楠盛情邀请下，张岱和余晓晨追随父辈足迹

首次踏上温州的土地，开启了一段“收获满满”的寻根之旅。

也因为她们的到来，我得以聆听了“小小”的故事，这个故事没有因为“小小”抵达延安而结束，相反，它只是一个开始，后来的故事更精彩，并且至今还在不断丰盈。

小小文艺轻骑兵来温州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伟大的长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艾思奇文集》《红楼梦》……2019年11月28日，温州市图书馆接收到523本珍贵赠书，它们是“小小”成员余康生前购置收藏的心爱之物，出版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期间。

得知父亲的藏书平安抵达温州后，身在北京的余晓晨通过微信给我发来一段文字：“父亲的藏书是他几十年心血所系，他的钱大部分都花在购买书上了，很多书上有他的批注。如何安放父亲的藏书，一直是压在我母亲心头的一桩大事。这次让父亲的藏书回到当年他奔赴延安的第一站，让它们能帮到更多人，是我母亲的心愿和决定，前几天她专门和我一起把五箱书送到了托运部。”

当年，经中共党员殷扬介绍，16岁的余康与众“小小”成员带着艾思奇撰写的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籍《大众哲学》，乘坐商船逃离上海奔向延安，两天后抵达温州（时称“永嘉”）。当时，中国北方港口及上海周边广大区域纷纷陷落，而地处国防最前线水陆要冲的温州，作为尚未沦陷的港口之一，发挥着沟通沿海各港口与抗战大后方的重要作用，成为了播撒革命火种的重要发源地。岁月轮转，如今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余康一生中最爱的书籍，再次携着他的印记来到温州，并把温州作为归宿。

一切仿佛是一个美好的轮回

而余晓晨的母亲马少芝做出这个美好的决定，也是缘于2019年夏天余晓晨

和张岱的温州之行。

那是6月夏至时节，温州时有小雨，驱散着一天的暑热。地处温州五马历史文化街区的中山公园美不胜收，凤仙花、牵牛花、睡莲、米兰开得格外热闹。蒙蒙细雨中，余晓晨和张岱在陈寿楠的陪伴下步入园子，当她们看到当年父母在此住过的中山纪念堂仍被悉心保护时，感慨万千。而走出中山公园，就在公园门口十几米开外，居然看到了仍在营业的南洋照相馆！要知道，如今每个“小小”成员家族中，都保存着1938年6月“小小”演出后在南洋照相馆拍摄的剧装合影。更让人兴奋的是，从南洋照相馆出来朝西走5分钟，她们来到了五马街上的原中央大戏院门前，“小小”在温期间，曾多次在这里演出抗日救亡戏剧，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大众电影院，但是80多年前的建筑和牌匾仍旧保存在原来的位置。“我们一起拍照留念吧！”余晓晨和张岱开心得像孩子，拉上带着她们踏寻“小小”足迹的陈寿楠，在巴洛克风格的原中央大戏院门前留下灿烂笑容。

“想不到以经商出名的温州人，把老建筑保存得这么好。”千里之外，马少芝很快知晓了女儿在温州的见闻，当时她心中为之一动。而此后几个月，温州人陈寿楠先生对待戏剧文化研究的

初心和执着，让这位亦多年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老人甚为赞赏，她最终做出向温州捐赠丈夫藏书的决定，因为相信：

“温州人这么重视和热爱文化，这些书在温州将物有所值，书有所用。”

的确，陈寿楠先生不仅搜集资料的能力超强，更有着一颗传承文化的赤子之心。余晓晨和张岱在温州的三天里，陈寿楠悉心指导她们在温州市图书馆查证到诸多“小小”在温州的细节资料，在余晓晨和张岱回北京后，陈寿楠连续数月每天坐公交车到温州市档案馆继续寻找、查证与“小小”有关的历史。最后，老人通过手抄、复印等方式，整理出40多页史料并寄往北京，这，为“小小”的孩子们复原充实“小小”最初的革命经历提供了重要帮助，也让包括马少芝在内的“小小”亲属们深受触动。



“小小”成员葛炎的夫人、93岁的陈捷在阅读温州日报2019年底刊发的关于“小小”的文章。

翻阅陈寿楠先生整理的史料，再对照余晓晨和张岱送给我的那本中共党史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发行的《源远流长——延安青年艺术剧院、联政宣传队回忆录》（该书中收录的第一篇文章《小小文艺轻骑兵》，就是“小小”团长陆静对“小小”的回忆），往事逐渐清晰——

“小小”的前身是“我们的儿童剧社”。自1936年成立后，剧社成员不仅参加了上海的宣传救亡活动，还直接投入到抗击侵沪日军的武装斗争，小成员拓路牺牲时不满15周岁。

1937年，惨烈的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这场战役也打醒了更多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蒙的“我们的儿童剧社”成员们，商议着离开上海去延安，根据“年纪小，队伍小”的特点，大家决定以“上海小小流动剧团”为名，于1938年4月28日悄悄离开了上海。这次行动对父母都保密，因为此前几个月他们也曾行动过，被家长在登船的十六铺码头阻拦住。

1938年4月30日午前，这些小小文艺轻骑兵来到温州，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20岁。经永嘉青年战时服务团副总书记胡今虚帮助，“小小”成员们住进了中山公园内的中山纪念堂里。楼上的一间大屋子，白天是他们排戏、练歌、

学习、开会的地方；晚上，就男女分两边打地铺睡觉，成了集体宿舍。在温州期间，“小小”成员基本每天都有两个钟头以上的集体自我教育，大家共同研究哲学、经济学以及社会科学基本理论。在中山纪念堂楼下，“小小”先后开设了救亡室、歌咏班、萌芽读书班。

除了在中山纪念堂活动，“小小”更多是到街头演唱抗日歌曲、搞化装宣讲、出抗日壁报、在剧场公演，温州的教师救亡协会还有人陪“小小”下乡，到瑞安平阳等地为农民和驻军演出。根据温州当时的报刊记载，“工农兵学商”各界都很欢迎这些年轻人去演出，不仅时常有人在“小小”演出时向他们投下大量铜板，还有很多卖饭菜的民众看到他们来买饭不收钱。《浙瓯日报》记者在1938年6月的一篇报道中写道：

“‘小小’以他们年轻的同志，薄弱的经验，幼稚的世故，能在恶劣的环境中住下了两月，能够抓住民众的心，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确实是不容易的。”

“小小”在温州期间，当时还只有9岁的陈寿楠就住在距“小小”驻地中山纪念堂不远的杨柳巷。那时，他常跟着姑妈到处看抗日戏剧，幼小的心灵深受影响。“身边每天都是抗日呼声，中央大戏院里挂满红色的抗日标语，民众爱国热情高涨得不得了，尽管我年龄小，

还是能理解这种爱国情感。”这个生长在温州小康之家的男孩，从此有了最初也是坚持一生的志向：“以后我一定要报考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成为一名戏剧专家，用戏剧为国家 and 人民服务。”

用戏剧为国家 and 人民服务，这也是“小小”的行动方向。在温州期间，“小小”共演出20余场次抗日戏剧，极大鼓舞了民众的救亡热情，其中，“小小”集体自编自导自演的独幕剧《打》，在当时的温州引起广泛关注，《浙瓯日报》全文刊载了《打》这个剧本。有意思的是，“小小”在温州时，曾首演陈寿楠的中学老师夏野士创作的《守住我们的家乡》。多年后，当已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30余年的陈寿楠编撰《温州进步戏剧史料集》时，正是因为夏野士的关系，特别注意并收录了“小小”的史料。

作为温州戏剧运动开拓者之一，夏野士以炽热的爱国爱乡激情创作了他的成名作《守住我们的家乡》，呼吁一致抗敌，并专门指定由“小小”来首演。该剧于1938年6月22日在中央大戏院首演，《浙瓯日报》记者焯林在报道中写道：“短短十五分钟的独幕剧而博得四次拍掌，更是不容易。记得鲁迅先生说：‘做文章要一句一句地削，削去厚的皮，肥的肉，余下来才似骨一样的

有力。’那么，野士的创作正合着这标准。但话要说回来，如果不是‘小小’剧团充满激情的演绎，又是另一场面。”

行进在抗日救国的激流中

“亲爱的温州同胞：本团在永三月，承大家热烈的同情和援助，建立起永不忘记的联系，我们是怎样的欣幸，同时我们要怎样地向大家感谢！我们丢弃‘家’的幸福，来负起为‘国’的任务……我们只有尽我们的绵力，推进民众救亡的工作……”

2019年8月，在北京，99岁的“小小”副团长张建珍和98岁的“小小”成员田蓝，高兴地看到了陈寿楠寄去的诸多史料，这篇刊登于1938年7月28日《温州日报》的报道，记录了当年“小小”离温时致温州同胞的信。让张建珍更为惊喜的是，她还在当年7月12日的《温州日报·笔阵》版面上，看到了18岁的自己为纪念“七七事变”写的小诗《壮丁礼赞》：“你愿意丢开你的爱人，这是多么的伟大！为的是——保卫你那垂危的民族，锦绣的山河。”

保卫祖国的锦绣山河，必须到延安去，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小小”全体成员出发时就有的信念和共识。1938

年7月，在温州的“小小”得到消息：国民党机关已发现其要去延安。当月28日，“小小”成员分乘小船溯瓯江而上，几天后到达金华。此后，“小小”按照党组织安排，从金华到长沙到武汉再到西安，一步步接近延安，接近理想。

去延安的旅程非常艰苦且紧张，回望历史，张岱和余晓晨不禁感叹：“这帮孩子的胆子真够大！”1938年8月4日，金华出版的抗日名刊《浙江潮》第22期上，发表了署名仇重的文章——《在贫病交迫下的上海小小流动剧团》，反映出“小小”一路的际遇；他们在长沙，赶上了日寇轰炸的长沙惨案；在武汉，赶上了日寇的进攻包围和“保卫大武汉”运动，每人每天只有两角钱伙食费。但无论在哪里，“小小”都坚持在街头宣传抗日，终于在9月初到达西安。一路上，“小小”经由永嘉地下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逐站接转组织关系，分别接受了南昌的黄道、长沙的徐特立、武汉的董必武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亲自接待和谈话。

“‘小小’成员们都是马克思主义笃诚的信仰者，他们亲眼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去延安是他们自主选择的革命道路，他们为此坚守了一生。”近年来，

梳理“小小”成员们奔赴延安的经历，张岱等“小小”的子女们发现，国民党当时也一直在争取这批年轻的文艺人才。“小小”在武汉时，国民党新建的三青团曾以各种优厚待遇为钓饵，鼓动“小小”加入国民党，但是“小小”成员们谢绝了这种“关心”，并到董必武那里及时汇报了这个情况。此后不久，经中共党员丁浩川介绍，“小小”全体成员坚定地在武汉就地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为“民先”的特别支部。

再往后的十余年里，“小小”成员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开始了斗争的新篇章，勇敢地行进在抗日救国的激流中。

从陕西泾阳的安吴青训班，到因“小小”成员集聚而新成立的青训班艺术连，从西北青年救国会战地工作团，到晋东南、晋察冀抗日前线，再到延安……“小小”成员陆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11月9日，在晋东南壶关县乡村，入党介绍人王平夫和巨宏两位同志将我约到一处田野里，为我举行了入党仪式。当时我们还在抗日前线，组织的一切活动都相当谨慎，即使是在自己的队伍中，入党仪式仍是秘密进行的。仪式非常简单，只是摘了几根枣刺，把入党宣誓誓词写在旱田上，我

庄严宣誓：‘终身要遵守党的纪律，听党的指挥，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多年后的今天，入党情形仍被田蓝铭刻在心，因为从那神圣的一刻起，他就向党和人民许下了郑重承诺，他的肩上正式担起民族复兴的使命。

和所有“小小”成员一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的田蓝，始终牢记当初入党时的誓言。新中国成立后，田蓝先后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办公室主任兼党总支书记、中国杂技团团团长兼党总支书记、中央乐团副团长，后来又调任北京市文联秘书长兼党组书记、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田蓝任中国杂技团团团长兼党总支书记期间，他上小学的一对儿女特别想看杂技，但那时票很不好买，怎么办？田蓝让妻子凌晨4点搬着小板凳去东单的杂技大棚旁排队买票。



因为眼神不好，只看清温州日报相关报道的标题和照片，98岁的田蓝让他女儿收好温州日报对于“小小”故事的报道，回头想办法细看。

与田蓝同岁的“小小”成员余康，1939年3月8日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城楼上秘密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主要战役，坚持在 frontline 进行宣传 and 救护工作，因表现勇毅，被授予西北解放人民功臣章。新中国成立后，余康继续在人民空军的政治宣传岗位上贡献力量。单位为他配有汽车，但他从来不坐，每天坚持骑自行车近一个小时上下班。在女儿余晓晨的回忆中，父亲生活十分简朴，虽然给自己和孩子们买书从不吝啬，但一条擦脸毛巾拧烂才会换掉。

“解放战争时期，我父母所在的西北野战军六纵教导旅，曾被马步芳骑兵兵团包围在甘肃镇原县屯子镇，那里没粮没水，战士们浴血奋战三天两夜，在第三天夜里接到上级命令突围时，要从高300多米、坡度约90度的悬崖上抓着绳子下到山沟里，再往外走，当时部队卫生部长王仲斌和一些重伤员因伤无法撤离，最后全部被杀害。三天里我方牺牲2000多人，父母一谈起这次战斗心情就无比沉痛。二打榆林时，我父亲亲眼看着一个突击连几百号人冲上去，当天只回来几个人，那个晚上，幸存的连长在月光下痛哭流涕的情景，父亲终生难忘。1987年，父母专门带我们这些孩子去榆林战场凭吊。”这些经历，让余

晓晨理解了父亲为什么经常教育她要珍惜现在的生活，不必计较个人得失；也让余晓晨明白了父亲生前写的最后一幅字，为什么是毛主席词作《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永不泯灭的回声

我将CD放入音响。

音乐一响起，整个人就被一种浓浓的情感笼罩住了。实在太熟悉了，这些都是曾经影响很大、在电影史上留下重笔的电影插曲：《阿诗玛》《渡江侦察记》《天云山传奇》《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每一首歌都能激起人们深远的怀念。这些节奏旋律，曾像空气一样在中国流动，慰藉并鼓舞了无数中华儿女，营造过一个时代的氛围。

但直到今年张岱和余晓晨来温州，我才知道，原来，这些连通过那么多心灵的音乐，都出自“小小”成员葛炎之手。当年“小小”从上海奔赴延安时，除了带进步书籍，16岁的葛炎还带上了他心爱的小提琴。在抗战一线，他永难忘记，那些随时可能赴死的战士们，是那么热切地盼望着音乐的抚慰，

有一次他的琴弦断了一根，连队立即派侦察员骑马赶到百里之外的县城去购买。战时经历让葛炎深切感受到音乐的力量。

如果说所有的故事都有一首主题音乐，“小小”故事的主题音乐中始终奏着赤子之心的旋律，它是那么的富有感情，抒发着对祖国、对人民深切的爱，这种爱，让“小小”故事的回声永不泯灭。这份爱，也让小小离家的“小小”成员付出了生命代价。日本投降后，为解放东北，“小小”成员莫愁（后改名为马骥）从延安被派往辽宁本溪市区委工作。那里敌情复杂，马骥在1947年参加武装土改时被土匪杀害。敬仰他的当地人民把他安葬在了本溪。新中国成立后，本溪人民把马骥牺牲的地方命名为马骥村，把马骥墓所在的山命名为马骥山。1949年底，马骥的母亲得知儿子牺牲后，从本溪要来马骥墓、马骥村、马骥山的照片，一直恭恭敬敬摆在家里的毛主席像前。

一寸山河一寸血，祖国，终于从血泊和苦难中被解放出来。

新中国成立之初，步步是艰难，步步是创业。经历过延安精神哺育和战争的考验，活下来的“小小”成员们把对革命的信仰和国家的责任落实到一个个工作岗位上：陆静成为新中国舞蹈事

业的开拓者，曹欣参与了经典战争影片《上甘岭》和《打击侵略者》的编剧工作，张建珍、吴梦滨成为新中国纪录片事业的第一代主管和编导，朱漪、鲁亚依成为中国著名儿童剧编导，葛炎为多部主旋律电影谱下经典乐曲后获得中国电影音乐特别荣誉奖……

“我们这些孩子小时候都是‘全托’。”说起父辈，“小小”的孩子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忙得没日没夜”。葛炎的长子葛尉平记事起，就记得父亲整天趴在桌上写啊写啊，写他的“豆芽菜”，激动时还不断地哼唱。1970年葛尉平初中毕业，上山下乡运动正在展开，如果托父亲老战友帮忙也许能留在上海，但是父亲并没帮他走“后门”，后来葛尉平在兰州一个工矿工作多年，牢记父亲教诲要做一个对祖国有用之人，坚持自学，恢复高考后，考上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如今事业有成。

作为张建珍的第二个女儿，用张岱的话说，“1952年我刚出生50天，父母就把我‘扔’在托儿所，两年没接出来。他们忙工作。”张建珍和丈夫钱筱璋参与制作了包括开国大典纪录片在内的表现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设的许多纪录片和新闻片。当时由于我国电影制片技术落后，所以团结了包括持永只仁在内的日本进步人士做技术指导。

1948年，张建珍的女儿和持永只仁的女儿同时得了白喉，而当时只有一支盘尼西林可以救命，最后张建珍夫妇选择把盘尼西林让给了持永只仁的女儿，他们的大女儿因此去世。这是张建珍夫妇一辈子的痛，钱筱璋埋葬女儿时坐在雪地里哭了一个多小时。这种大仁大义，也让持永只仁一家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深厚感情，后来持永只仁成为新中国动画奠基人之一，他的女儿则倾力帮助侵华战争中的中国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索取战争赔偿。

“小小”的故事说不完，它是老一辈革命者人生的缩影。伴随着几十年世事沧桑，“小小”的成员们也经历了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但不管遭遇怎样的坎坷，一丝一毫没有改变的，是他们参加革命时的初衷和跟随共产党的决心。

“我们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小小’的故事讲好，让后代知道现在祖国的富强是老一辈坚持革命精神奋斗出来的，年轻人有责任传承这种精神，

把中国建设得更好。”2019年年底，“小小”的孩子们告诉我，他们已经在琢磨着为“小小”的传记写开篇文章。晚年的葛炎，也一直在写作有关“小小”的音乐剧剧本，他为这个后来未曾发表的作品取名为《逃离孤岛》……弥漫的硝烟中，敌人正在“大扫荡”，他生着重病，部队一位老炊事员，用小毛驴驮着他绕过了敌人的封锁线，然后，老百姓又用担架抬了他六七天……这段死里逃生的战时经历，当然是一定要写进来的。这段死里逃生的战时经历，也始终提醒葛炎“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入股分红’”。葛炎生前和好友、著名编剧陆寿钧谈到这段经历时说：“如果没有人民群众，我这条命早就没了。我是个凡人，有时个人利益也会向上冒，但每每想起这些往事，我就会冷静下来。对我来说，只有努力、努力、一再努力，为人民、为新中国多唱赞歌！”

这是“小小”成员共同的心声。

（作者单位：温州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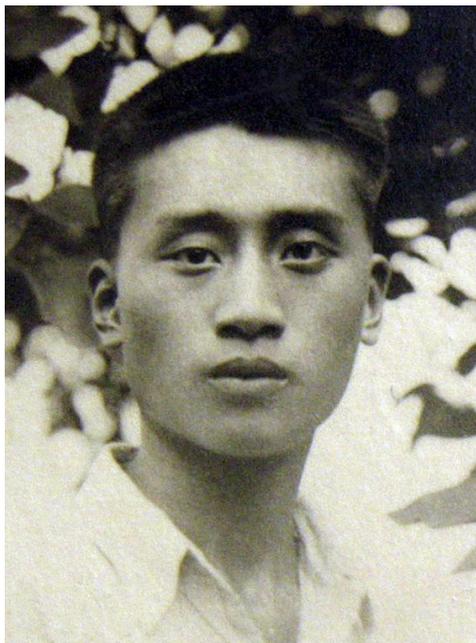
不忘初心的老革命——宋廷铭

◇ 昆仑岩

2019年秋，平阳籍革命老干部宋廷铭的子女接到通知来到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代表父亲领受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父亲是今年1月份离开我们的，正好在国家规定发放范围之内。能够活到新中国70周年大庆之年，生后还能领到这枚珍贵的荣誉纪念章，是对父亲革命一生最好的褒奖和安慰。我们子女们都很激动，父亲在天之灵一定也很激动！”宋廷铭之子、原总参管理保障部政委宋方敏将军如是说。

宋廷铭（1923—2019），浙江平阳鳌江人，是中共平阳早期地下党重要骨干，新四军老战士，中国电子质量管理资深专家，江苏省厅局级离休干部，江苏南京温州商会顾问，享年96岁。

抗日救国，戎马革命。宋廷铭1923年2月（农历1922年12月）生于浙江平阳



时任中共平阳县委直属文化支部书记的宋廷铭（1941年9月）

鳌江镇，系抗日战争时期作出倾家毁业沉船御敌大义壮举的当地著名爱国企业家宋上楠先生之三子。1935年鳌江小学毕业，1938年到温州联立中学读书，15



1941年4月温中剧团在温州中央大戏院公演《塞上风云》（中排左8为宣教股长宋廷铭）

岁的他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五月读书会”，16岁加入“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次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积极开展学生运动。“皖南事变”后，他以宣教股长身份，组织领导“温中剧团”演出多场反投降、反分裂抗日话剧《塞上风云》，轰动温州全城。1941年在平阳雁门小学从事地下党活动，任中共平阳县委直属文化支部书记。10月经组织决定，前往苏北参加新四军，先后任抗大五分校苏中大队三队副班长、一队文化干事，抗大九分校三队（干部队）文化教员、苏中公学组织干事、政治教员。1945年4月，调任新四军一师军工部工务科员、军工厂政治指导员，后任苏东军区军工部总工会宣教部长、军工总厂工会主任，华东野战军军工部军工一总厂副教导员、华野后勤政治部政治协理员。战争年代，曾在粟裕师长领导下，

转战苏南，和国民党顽固派开展“反摩擦”斗争，并长期在军工战线英勇奋斗，为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

国防工业，建功著述。他长期从事解放军兵工系统政治、文教和工会领导工作，1949年全国解放后，历任华东军区后勤军需生产部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华东兵工工会生产工资部副部长、文教部部长。1950年6月作为解放军兵工系统代表，参加旁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1953年集体转业后，为发展新中国国防工业努力贡献，先后任华东兵工工会副秘书长、南京地区工作委员会第二主任；1954年底，任中央部属七七二厂（南京电子管厂）党委书记，其间曾给毛泽东主席写过14000字的报告，被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引起各级领导重视，为推

动沿海地区电子工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1963年至“文革”前，任南京市总工会秘书长。1969年底夫妇一起主动报名，下放到江苏洪泽农村，积极发挥老干部作用。1975年春调回省里，重拾国防电子工业本行。20世纪80年代，主持江苏电子工业质量管理工作，担任中国电子质量管理协会常务理事、江苏省电子质量管理协会副理事长、高级经济师，结合实践探索创新，多次在《经济管理》《质量管理》等全国性学术刊物和部级内参发表文章，获奖十多项。

发挥余热，不忘初心。1983年底，宋廷铭作为厅局级干部离休（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荣任中国电子质量管理协会资深会员，并担任新四军抗大南京校友联谊会副会长和新四军苏中公学校友会代会长，继续关心国家经济建设，弘扬优秀历史文化，撰写发表多篇回

忆文章，为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革命精神，实现伟大“中国梦”尽心尽力、鞠躬尽瘁。他对家乡感情很深，积极支持在宁温州商会工作，关心帮助同乡亲友们的事业发展；并且不顾年老病弱，先后多次回乡参加“振兴温州经济恳谈会”“平阳抗日救亡老同志座谈会”“纪念粟裕同志百年诞辰和中共浙江一大陈列馆开馆仪式”等有关活动，为家乡改革发展出谋划策；还特别重视家乡历史文化建设，经常给《红色平阳》等刊物撰写文章。2012年10月，他晚年所著回忆录《鳌江潮》正式出版。他还多次在病房里接受家乡媒体记者采访。2018年五一节那天，根据温州平阳文史资料收集的要求，97虚岁的宋廷铭老人在病房里，按下了鲜红的手模，并亲笔题写了自己的心志——“不忘初心！”他的一生光明磊落，清廉正直，



宋廷铭对家乡感情很深，多次回温州平阳探亲，参加有关活动，为家乡改革和建设出谋划策。

这是1980年春，去苏北参加新四军近40年的他首次返乡，和老同志在母校温中校史馆前合影。

忠诚信仰，关爱后人，注重传统教育和家风建设，所培养的一子三女家庭中，有两位共和国将军，10位研究生以上学历者和6位高级职称专家。

2019年1月13日（戊戌年腊月初八）凌晨4点45分，宋廷铭先生在南京安详逝世。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领导参加并主持告别仪式，高度评价：“宋廷铭同志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清廉正气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他顾全大局，襟怀坦荡，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忠心耿耿；他廉洁奉公，生活俭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受到干部群众的尊敬。宋廷铭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老同志，我们将永远怀念他。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优秀

品德，不忘初心，团结奋斗，为进一步加强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原沈阳军区副政委潘瑞吉中将，原江苏省军区副政委刘战勤少将，原江苏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国防科工办储小平主任，北京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江苏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温州驻京办领导，中共平阳县委领导、鳌江镇委领导，江苏温州商会、南京温州商会领导等各界人士和亲友100多人参加告别仪式，表达了对这位革命老战士的深切哀悼和怀念。

今年清明，根据宋廷铭先生的遗愿，他的部分骨灰由子女们带回平阳鳌江，撒入家乡的山水和大地。这是一位平阳老地下党、老新四军对家乡的一份感情回报，也是对早年革命的一份精神眷恋。



1983年6月参加平阳抗日救亡老同志座谈会期间，宋廷铭张颖夫妇与王载弘宋爱兰夫妇、金冶等在鳌江边合影。

浙南几位英烈的红色家书

◇ 郑昌儒

这里我收集整理浙南几位英烈的红色家书。这些家书不仅记载了革命战争年代血与火的历史，而且承载着绵长而醇厚的骨肉亲情，真实反映了在国破家亡的危急关头，共产党员、革命志士“位卑未敢忘忧国”、心系家国的情怀，为了革命胜利和祖国富强、人民幸福，不惜英勇献身的豪情壮志。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这些革命烈士的家书是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最生动、最有力的教材。正是赵一曼等无数革命先烈“愿拼热血卫吾华”，用生命保存了革命火种、用信仰淬炼了民族精神，才换来新中国今天的和平时光和幸福生活。通过重温历史，重温英烈的红色家书，从中汲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进的精神力量。

—

蔡鸿猷，乳名德宣，字辉甫，号哲

臣。生于1897年4月，缙云县小章村人。他小学毕业后，随父母迁居兰溪县马阜区租种地主田地，曾任小学教员。1924年8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步兵科学习。这时，他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读书期间，他先后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广东革命军第一次东征、削平滇桂军叛乱等战斗。1925年9月，他军校毕业后，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连党代表等职。参加了广东革命军第二次东征，为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不怕流血牺牲，作战勇敢。1926年，奉调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缉私卫商总队（后改名税警团）任第一团第一营党代表。1927年2月，升任税警团上校党代表。缉私卫商总队和税警团是我党掌握的主要革命武装之一。蔡鸿猷在为革命政府筹集经费、打击走私、查禁烟苗、维护经济秩序的工作中，与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7年4

月，蒋介石策划广州“四一五”惨案，实行清党，大肆抓捕杀害共产党员。4月16日。蔡鸿猷不幸被捕入狱，关押在广州郊外南石头惩戒场。反动政府组织特别法庭，审理清党政治犯。他被提到广州公安局拘留所候审，先后被审数次，均坚贞不屈。蔡鸿猷家中有祖母、父母亲、姐姐、妹妹、弟弟和童养媳诸氏。他外出多年，未曾回家，终因忙于工作，未能返浙探亲。蔡鸿猷被审问后押回狱中，他对同狱难友们说：“余20小时后当与世长辞矣。”他提笔给父母亲写下最后一封家书：“我最亲爱的双亲：缺候许久了，真惭愧，而且抱歉得很。你们现在好吗？我乘此片刻晨光，写下几句给你们留着做纪念。请你们以后不要想念我。不要想到我而悲哀。这是我最后所希望于我亲爱的双亲的。”表达了他宁死不屈的决心。接着他写下了两首绝笔诗。第一首七律：“违别双亲七八春，断梗浮萍苦飘零。天涯寄迹音书绝，患难偏增骨肉情。珠海悲歌声惨切，白云呜咽雁不鸣。昔日青山今何在，望断秋风五羊城。”前半部分追忆离别亲人后颠沛流离生活，表达对亲人刻骨铭心的怀念之情。后半部分表达了对革命力量被反动势力摧残所怀的满腔悲愤之情。他又提笔写下一首五绝的绝笔诗：“赤血染黄花，磷光照万家。两

度中秋月，半生志未偿。”面对壮志不能酬，他毅然要以自己的殷红鲜血染红正在开放的黄花，以自己的微弱磷光照亮黑暗笼罩下的万家。他将绝笔信和诗交给同监同乡李某，托他日后带出。下午4时，狱警果然来传呼。蔡鸿猷拖着脚镣手铐走到李某跟前，从容地说：“余去矣，他日君如得释，为我言于父母，勿以亡儿为念。”说罢，昂首挺胸步出狱门，迈向刑场，视死如归，英勇就义。1951年，国家内务部追认蔡鸿猷为革命烈士。1958年6月1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复函中共缙云县委，亲自证明蔡鸿猷是共产党员，以后被捕牺牲，要求地方政府给予烈士待遇，并对其家属代致慰问，表达了人民总理对革命烈士的深切怀念。

二

陈再华，原名锡光，又名黄光，笔名白明，平阳县鳌江镇人，生于1904年8月。从鳌江公学毕业后，1919年就读平阳县学堂。由于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第二年转入温州艺文中学读书。当他提前修完中学学业后，立即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后又到上海自治学院读书，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1927年又去上海进入光华大学读书，结识了同学

中的共产党人，进一步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1929年，他来到广州，在培正中学当国文教员。他带领学生去三元里、沙面实习考察时，就联系“平英团”和“沙基惨案”的历史事实，揭露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激发学生们的爱国主义思想。他还把爱好文艺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培正文艺研究社”，出版《培正文艺》杂志。他还从校内发展校外，联合“现代创作社”，先后组建“一般文艺社”“新文艺评论社”和“新兴文艺社”这些秘密社团组织，出版刊物。他还帮助中山大学成立“左翼剧联广州分盟”，成为领导广州抗日话剧的核心力量。他还组织“抗日社”和“新兴读书会”的进步青年成立秘密的“苏维埃之友会”，开展支持江西中央苏区的募捐活动。

日寇侵略我东三省，陈再华有感于国难严重，写作了一首题为《奋起救国》的慷慨激昂的歌词，由广州著名音乐家何安东谱曲，并灌制成唱片。这首歌比《义勇军进行曲》早三四年风靡于南方各地，特别是广州、香港一带，当时几乎人人会唱。

1933年，广州和香港等地自发组织了許多进步文化团体。为了尽快把这些进步团体置于党的统一领导之下，陈再华和香港进步人士黑炎、李拉特、陈

光及广州潘平凡等人商定，由他执笔起草关于广州和香港的文化运动和各团体组织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我们都知团结是力量，文字是武器”，要求“组织两地所有进步的文化工作者推进文化运动”，争取党和左联的具体指导。陈再华利用这年暑假期间回乡的机会把这份材料带到上海，后被转送上海中共中央特科。中央特科十分重视这份有见解的报告，经考察，决定吸收陈再华和潘皮凡为中共党员。陈再华由中央特科直接领导，潘皮凡由陈再华单线领导开展工作。他俩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广东、香港一带的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的情报。

陈再华回到广州后，他俩决定把通讯联络的地点放在香港。不到两个月，潘平凡的身份暴露了，再华就帮他及时转移到上海。穗港的情报工作由再华和另一同志负责，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搜集了大量情报，并先后发展10多个同志。1934年7月，他再次利用回乡探亲的名义，到上海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党组织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肯定他搜集的情报对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起了积极作用。并指出他在广州搞得太红，会有危险，要注意隐蔽斗争。1934年10月，广州一批革命青年暴露身份，再华通过组织把他们转送苏联学习。这年11月

26日，陈再华在广州知用中学观摩教学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武装包围而被捕，关押在广州警察局的监狱里。警察局长亲自出马审讯，他始终不吐露真情。敌人恼羞成怒，更加残酷地折磨他。于1935年1月24日，将他杀害于黄花岗侧的荒坡上。牺牲时只有31岁。

1934年夏，他回到广州进行革命活动时，已察到自己的处境极不安全，但做好了牺牲自己的思想准备，继续坚守工作岗位。他在被捕前的14天曾写了一首题为《献给母亲》的诗：“这是旧社会走到最末的一阶，这是矛盾对立构成了稳健的新梯，你的儿子就这样朝前走了！退后的，只是那些在火山口作骷髅舞的人哟！退后的，只是那些哀号、流泪、屈膝的人哟！母亲呀！他要永远地前行！所有母亲的儿子都跟着起来了，锄头、铁铲、阔斧、鹰嘴凿，以及一切可以做我们武器的，都让它紧握在手里吧！为着绝对的多数，为着自己的子孙，坚强地组织起来，众人的血是流不尽的，母亲呀，他要永远的前行！……”他这首《献给母亲》的诗，表达了他为革命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心声。

三

周饮冰，原名周涓，1913年10月17

日出生，平阳县水头镇人。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后，在家乡小学任教。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走出校门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初，任中共瑞安县仙降区委书记。1937年参加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白区工作团工作。1937年10月红军挺进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周饮冰任该总队驻温州办事处副主任。其寓所温州九柏园头17号成为办事处办公地址。1938年1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以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的名义在平阳山门创办抗日救亡干部学校。他积极介绍进步青年入校学习。

1938年3月，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开赴皖南改编为新四军后，周饮冰任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主任，积极为新四军提供后方支援，动员和组织大批青年参加新四军。1938年5月，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成立，省委机关由浙南游击区迁入温州城区，通讯处成为省委的交通联络中心。10月10日，通讯处被国民党浙江省当局查封，数人被捕。次日，周饮冰奉命到温（州）台（州）防守司令部交涉，结果也被扣押，转囚于上饶盘石渡李家村看守所。同年冬以“危害民国罪”名义被判刑15年，转囚福建浦城陆军监狱。在狱中任中共特别支部组织委员。1942年2月，组织难友越狱未成。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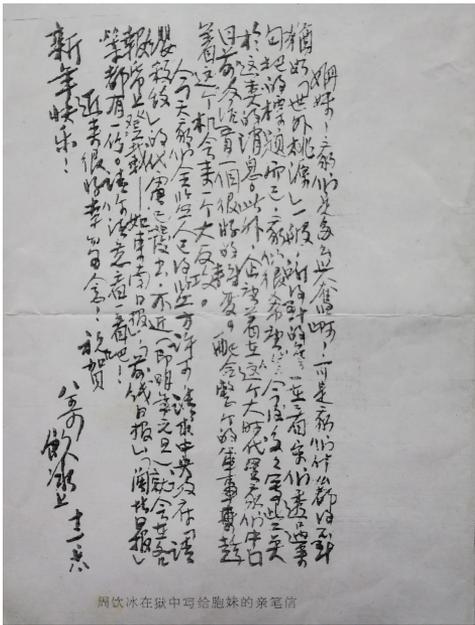
月，以“组织煽动犯人暴动”的罪名被杀害。

周饮冰关在狱中4年多，多次与其胞妹周珊珊等家人有书信往来。他来信说：“只要国家、民族有前途，我们个人才有前途。”要设法克服困难，坚定抗日救亡信心。他写的多封家书只留下一封，现存温州烈士纪念馆，那是他牺牲前一年年底写的。他在给胞妹的信里说：“企望着在这个大时代里。我们中国目前政治有一个很好的转变，配合整个的军事趁着这个机会来一个大反攻。今天我们全监人已得到监方许可，请求中央政府‘请缨杀敌’的代电已发出。不近（即明年元旦）就会在各报纸上登

载。……”周饮冰身在狱中仍时刻关注中国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甚至准备上前线“请缨杀敌”，血洒疆场。

四

杨炎宾，又名典鹤，玉环县人，生于1921年。在城区环山小学毕业后，到杭州清波中学读书，因经济困难辍学回家。1937年12月到平阳县参加闽浙边临时省委举办的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学习。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玉环县党支部宣传委员、玉环中心区委宣传委员、玉环县委书记等职。1938年至1940年两年多的时间里，一边积极从事党的工作，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他先后写了10多本学习笔记。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后，杨炎宾带领几个共产党员一起在坎门一带进行散发、张贴《宣言》。国民党玉环县长方引之知道后大为震惊，责令警察所派员押送杨炎宾等人进城。到县政府，与县长方引之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乘机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道理，要求国民党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一致，共同御敌，拯救祖国于危亡。一席话说得方引之哑口无言，只



周饮冰在狱中写给胞妹的亲笔信

得乖乖放他们出来。1940年，杨炎宾转入地下活动，离开玉环，担任中共临海县委书记和台（州）北联络员兼三门特派员。1942年7月，在三门县海游地方被捕，押送至临海，关在西门外台州监狱。由于杨炎宾受到严刑拷打，已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最后牺牲在牢狱中。

杨炎宾1940年上半年遵照党组织决定不告而别，秘密离开家后，先后给他父母亲写过4封信。他在信里，深情地表达对年迈双亲的无限眷恋，也诉说了作为共产党员应该义无反顾地献身革命事业的崇高心愿。他决心选择后者，舍弃前者。他在信中写道：“本该于年终返家，奈因事忙不能抽身，望大人恕罪。……当然家中人（对我）的记念，我是时刻不会忘记的。同时，你们一年老一年，我何尝不知道。但是，父亲，我们现在虽然不能共聚一堂，欢度除夕之夜，但是，你如果长命的话，。你总可以看到将来的。……我不愿自己无声无息的升官发财，做那些被人仇视的事。我之所以在外，不回家中，是为了我那志向的实现。……”这是多么感人肺腑的语言！谁说英雄人物不重感情，人非铁石之躯，只不过他们在遇到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相矛盾的时候，能够抑制个人的感情，牺牲个人的一切，做到无条

件服从革命利益罢了。这就是英烈们最可宝贵的品质。

五

陈展，原名陈圣福，1917年出生，乐清市虹桥镇人。他小学毕业后在虹桥净土堂当教师。抗战爆发后，1937年9月，他参加虹桥战时青年服务团组织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认真学习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重要文章，从中受到教育。1938年6月14日，他怀着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瞒着他的亲人，背井离乡，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他动身前夕，悄悄地放在他妻林杏华枕头底下的一封向亲人的告别书。他一路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学习期满被分配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任被服厂政治教导员，并随师部到山西。1940年4月，他被调到新十旅政治部任军法干事并审判员，党内历任支部委员、支部书记、总支书记等。1943年10月，太行军区与一二九师分开，陈展任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部军法干事驻东沟村。东沟村遭日军多次扫荡，到处是残垣断壁。陈展随部到达该村后，他与农民一起挖窑洞，带头拉牵播种、挑水扫院，并和他们促膝谈心，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说：“为了拯救天下受

苦受难的人民，一个革命战士随时都要准备流血牺牲。”太行英雄赵恒德率领的一支抗日游击队，在石太线清泉车站抓获日军中将林木川三郎，据称是日本天皇女婿，交由军法处看管。日军为了抢回林木川三郎，于1945年1月2日调集优势兵力包围了军分区司令部驻地堡下村和政治部驻地东沟村。军分区机关和部队立即投入战斗，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军法处押着林木川三郎随军分区机关转移，政治部主任率部和民兵一起进行反击突围。陈展率警卫班战士沉着应战，几位战士相继倒下，只剩下他坚持和敌人战斗到底。“与其生而辱，不如死而荣。”陈展子弹打光了，继续与敌人徒手搏斗，最终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时年28岁。战斗结束后，东沟村支部和民兵打扫战场时发现陈展双目怒睁，手握拳头，浑身血迹，棉衣棉裤都被撕破了。足见其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和英勇搏斗的革命精神。

他离家时写给妻子林杏华的告别书说：“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千千万万的父母孩子的生存和幸福，我只好横下一条心，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忍心和家人告别了。别难过，莫悲伤，也不要到处找我，即使到处寻也是找不到的，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胜利后回来见……”陈展虽然没能等到抗战胜利后与亲人相

会，但他为革命、为抗战胜利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六

陈爱中，原名仇康阜，谱名仇善智，乐清市人。出生于1902年。1938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中共乐清大荆分区委宣传委员、芙蓉区委书记、乐清县委组织部长兼芙蓉区委书记、台（州）属特委政治交通员、乐清大荆区特派员、台属南地区特派员等职。1943年3月，参加中共浙东区委举办的第一期党训班学习，结业后留在浙东抗日根据地工作。历任中共（余）姚慈（溪）县沿江区特派员、区委书记，鄞（县）慈（溪）县委组织部长，鄞县县委组织部长等职。抗战胜利后留在浙东四明地区坚持斗争。历任中共鄞县特派员、慈（溪）镇（海）县特派员、鄞（县）慈（溪）县特派员，四明工委委员等职。

1945年5月，其妻子张荣源由政治交通员护送到浙东，被安排在浙东游击纵队被服厂，任生产车间班长。同年9月，浙东游击纵队奉命北撤，陈爱中和其妻子留在当地坚持工作。1946年7月，其妻张荣源加入中国共产党。陈爱中调任宁派特派员，为了有利开展白区工

作，选择在宁波市区组织一个假家庭，由女同志陆子奇为主妇，让张荣源做她的娘姨，帮助处理家庭具体事务。这个假家庭对外打着公平柴行招牌，对内是党的联络站。1947年4月12日，由于叛徒出卖，陈爱中和其妻张荣源，还有几位党员被捕。陈爱中等被押解到杭州陆军监狱，由省保安司令部 and 国民党特种刑庭先后审讯。敌人施用种种酷刑，妄图从陈爱中口中掏出党的机密，可是他坚贞不屈，不吐一字。

陈爱中积极参与狱内斗争，破坏敌人的各种阴谋。他串通各囚室的联系人，通过个别同情共产党的狱警和国民党犯罪军官弄来报纸，或通过新来的难友口述国内外形势，汇集整理成文，传递各囚室，供大家学习。还在狱中策动声援于子山事件。其妻子张荣源在狱内始终坚持一个口供：“我是娘姨，是帮工，其他什么都不知道。”最后被判刑4年。在狱中，陈爱中对其妻很关心，也很严格，经常利用“放风”时机，教育她一定要坚定革命立场不动摇，决不能向敌人吐露党的秘密。当年11月初，他在狱中秘密给妻子递去一个纸团，告曰：“我老虎落笼，过些天将要牺牲，过去的口供，你要坚持，组织是不会忘

记你的，要把弟弟带出来革命。”6日，陈爱中被押回宁波在江北草马刑场英勇就义。1949年5月，杭州解放，党组织派人热诚地接张荣源出狱，并立即分配到镇海县工作。不久，陈爱中的胞弟仇定昌到乐清县大队参军，走上了革命的征途。

（作者单位：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浙南分会）

参考文献：

- 1.《不朽的战士》：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 2.《薪尽火传》：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浙江教育出版社编，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 3.《新四军中浙南将士》：浙江新四军研究会浙南分会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 4.《浙西南英烈》：中共丽水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
- 5.《浙南儿女革命风采》：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浙南分会编。
- 6.《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

橘井留香

◇ 施菲菲

瑞安的利济医学堂名闻天下，其创办人有陈虬、陈葆善、陈黻宸、何迪启。

利济医学堂创办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是经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中华医学会史学分会多位专家论证确定的中国第一所新式的中医学校。它采用欧美办学制度和方传授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历时17年，培养了300多名中医人才。这些中医名士遵循利济医学堂“先施苦药利民病，更待良方济世穷”的办学宗旨治病救人，给黎民百姓带来



安康，造福桑梓。

橘井泉香，陈葆善在“利济”这块园地上辛勤耕耘，为培养中医人才呕心沥血，他尽情释放着潜伏自身的巨大能量，在利济医学堂的功劳簿上英名灼灼。

勤奋读书

陈葆善（1861—1916）字栗庵，晚号湫濲斋。祖上是瑞安商贾，家资殷实。陈葆善少年时聪颖，读书异常用功。他胸有大志，无心打理家业，昼夜苦读，一心要“读以取仕”，考取功名，济世强国。20岁时中秀才，因为生病，有意于中医，拜陈虬为师。他殚精竭虑，伏案钻研医书，十年寒窗，终成大器。当时利济医学堂注册者200多人，按“道济群生，泽衍万世，津梁广启，执圣之权”16字区分教师院次，就是说像族谱一样给教师排辈分。陈虬自任主

讲，下分初传、再传、三传弟子，依次为“道”“济”“群”等字辈，陈葆善的院次为“道一”。

利民济世

陈虬是维新派思想家，他认为“人才奋起，国势自强”。清光绪十一年（1885），陈虬为了“实欲借医学堂为造就人才之地”，发起了创办利济医学堂的倡议。作为陈虬首传弟子的陈葆善，先生一呼，便首起响应。他不仅自己入股，还动员女婿何迪启、族兄陈黻宸出资募股。陈虬、陈葆善、陈黻宸、何迪启四人共济，筹成十股股金，每股40英洋，作为医学堂开办经费。接下来，陈葆善又投入选校址、建校舍、出教材、制定学校规章制度、招考学生等等工作，在含辛茹苦中一座具有西式办



学风格的中医学堂赫然问世，它像一面旗帜，在浙南瑞邑迎风招展，并将它独特的影响力幅射向全国，在中国医学史上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利济医学堂的成功，其中不乏陈葆善的一份付出。办事稳妥、志虑忠纯的陈葆善被陈虬推为监院兼总理。社会活动繁忙、人际交往纷纭的陈虬把医学堂的管理放心交给首传弟子陈葆善来经营。

作为教师，陈葆善诲人不倦。在利济学堂执教期间，他为浙南地区培养了许多具有高度理论水平和丰富临床经验的优秀中医。被老百姓誉为“神医”、名扬浙南的金慎之就是陈葆善的门下。

杏坛春暖

十年学医，打下坚实功底，使陈葆善的医术日臻精湛。有“东南第一笔”美誉的池志澂曾评价：温州博学的良医除了蛰庐（陈虬）外，就是栗庵兄（陈葆善）为最。当时，无论平民百姓，还是世家大族，请陈葆善看病者络绎不绝。孙诒让的顽疾曾由他治愈，在《瑞安孙家往来信札集》第206页中，就刊有孙诒让写给陈葆善的两封回复信，其中一封是谈病情的。陈葆善救活奄奄一息的花农潘志雅的故事，更是在瑞安坊



间被老百姓传得神乎其神。潘志雅曾在利济医学堂当过药圃的园丁，也曾和陈葆善家当过花农，专事菊花。那年潘志雅患病，垂危时，家人绝望地准备将他运回莘塍九里老家办理后事。陈葆善闻讯，将潘志雅接到自己家里，调药日夜护理。经多日医治，潘志雅起死回生。对给予他第二次生命的陈葆善，潘志雅感恩不尽，视他为再生父母。晚年，陈葆善生病，潘志雅为救恩人，割股献血。陈葆善亡故后，为纪念恩人生前酷爱菊花，潘志雅每年金秋时，在陈家举办花展，将自己精心培育的多个菊花品种向街坊邻居展示，以告慰陈先生的在

天之灵。

名医与花匠交往的故事，在民间的流传中释放着暖意。

白喉是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光绪十九年（1893），陈葆善一家四口得此险症。先是大女儿发病，在给大女儿治病时，他采用张养吾《白喉捷要》医书中的验方，结果大女儿病情加重。陈葆善马上改用郑梅涧等人的清肺养阴法治疗，每天三剂，大女儿得救。后来次女、小儿又染病，陈葆善也用清肺养阴法，结果次女得救，小儿却夭折。

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中，陈葆善发愤钻研，一心攻克白喉险症。他创制了“三炁降龙丹”，重用石膏、犀牛角清热解毒，又用西洋参、地黄来养阴，双管齐下，疗效显著。在白喉流行时，此方治好不少患者。同行中也有许多人传抄陈氏验方，收效非常好。

诗兴盎然

“君志趣淡雅，有泥淖轩冕之风，尝筑室数楹于隔河，蒔花神树，萧然有以自乐。好诗画金石，尤工昆曲。每当秋日风高，菊花怒放，独主词坛，物色地方名流，弹琴歌咏，引而置诸骚雅之林。于是吾瓯人士，无不知有湫漻斋陈栗庵。其医名直流溢于浙东西三江两湖

士大夫之间……”池志澂所撰的《陈栗庵墓志铭》中如是陈述。

陈葆善的藏书楼“湫漉斋”因雅士咸集，赋诗、弹唱、赏花而缥缈漫四方。

如今的瑞安市公园路7号就是当年湫漉斋的旧址。“藏书楼的书都是我祖父节俭省钱而购置的，我少时见过每年六月六晒书的情景。后来我也晒过书。

‘文化大革命’时，被红卫兵抄家拉去烧了，有好几板车，其中有祖父与吴昌硕来往的书信，有张立纲、池志澂赠送的书画，还有当时印医药专著的雕版，可惜啊！”采访时，陈守泽（陈葆善的孙子）告知湫漉斋藏书楼中书画等文物的痛失。

在《陈氏宗谱》中，录有陈葆善多首诗作，其中《咏菊二十八韵》曰：

“菊花虽晚荣，珍而悦人目。熠熠黄镂金，灿灿白编玉。紫艳与红英，秀逸亦脱俗。斓斑间五采，意姿弥静穆……不逐春风荣，岂畏秋霜醒。傲骨过兰梅，贞操比松竹。晚节得此君，神交宜挚笃……”

遗作惊世

兀兀穷年地苦读，丰富的临床实例，苦心孤诣地探究，陈葆善留下的医



学专著惊世骇俗。

《白喉条辨》是陈葆善认真钻研国内多部有影响的白喉专著之后，根据自己治疗白喉患者的临床经验，潜心摸索积累而成的一部医书。全书分有辨病源、辨经络、辨脉理等15个论题，系统地论述了白喉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以及用药禁忌、善后调理等内容。该书雕版刻印问世，首次刊登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利济学堂报》，曾编入《中国医学大成》。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再版该书3次，据说发行量超过两万多册。20世纪80年代，《白喉条辨》载入《中国医学大辞典》和《简明

中医辞典》，其作者陈葆善名字被录入《中国医学名人志》。

《燥气总论》成书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到民国14年（1925）由徐乃昌作序，漱溲斋刊行石印本。民国25年（1936），上海中医书局把此书收入《中国近代医学丛选》。该书条理清晰，首明本义，次述病理，再详脉候，终出治法。此书填补了《黄帝内经素问》“秋伤于燥”一节的空白，陈虬曾赞扬道：“呜呼！斯道沉埋，垂四千年矣，秋燥之论，至本朝而始有定说。”

作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燥气验案》两卷，收集了先生在治疗燥气的临床实际中的医案二十一例。他对每一个案例都反复辨析，力求与《燥气总论》所阐述的内容互相印证，以达到检验其理论与实践的互相统一。在叙述病例的脉象、症状以及治疗上，陈葆善用语质朴、议论明晰，语言通俗简明，在临床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草时义》是陈葆善的病中随笔，撰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是他博采广闻、亲身体验的结晶。全书记载药物117种，对药材辨别、品种规格、栽培产地、加工炮制、等级时价，甚至术语方言，都有记载。

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撰写

了《艺菊琐言》，这是一部论述菊花栽培方法的专著。陈葆善的此书已发展到十八目，包括贮种、土宜、地利、施肥、插花、分头、换盘、培植、修饰等。

陈葆善还著有《月季花谱》《漱溲斋吟草》《曲谱》《兰蕙同心录》等。

瑞安市公园路5号为3间砖木结构的平房，是陈葆善故居。旧时的上海中国仿古印书局瑞安印书分局就设在此处，创办于1934年的《瓯风杂志》曾经在这里刊印，陈葆善的儿子陈准担任杂志的副理事。

陈准（1900—1941）字绳夫，少时从李笠为师。他好思善学，先后曾经担任过瑞安县图书馆通俗部主任、中山图书馆学部主任、瑞安教育会干事长、上海中国仿古印书局编辑部主任等职。20世纪30年代初，陈准与林志甄等人在瑞安杨衙街（现为公园路）5号创设“温州仿古印书局”（也称瑞安印书分局），致力于乡邦文献的整理校印，编有《瑞安孙氏玉海楼藏书目录》《殷契书目录》等，著有《韩非子集解校记》《淮南子校记》《管子集注》等。

（作者单位：温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永嘉前辈读书多”名联的来历

——孙锵鸣与会文书院

◇ 陈盛奖

清光绪八年（1882）秋，瑞安名士孙锵鸣受平阳顺溪名绅陈少文邀请，偕宋恕父子游南雁荡山，光绪十年（1884）作《题会文书院》诗，其兄孙衣言继作《陈少文重筑会文书院，其远祖陈贵一兄弟读书处也，予弟有诗，即用其韵》诗，一唱一和。陈少文把他们的诗都刻在石碑上，可能准备要立或嵌在会文书院某处，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搬到书院，至今还“卧”在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顺溪古屋建筑群陈氏第四份（陈少文故居）房间地上。



平阳顺溪陈少文故居

诗歌跋文解读

孙锵鸣《题会文书院》诗曰：“昔贤遗址坠烟萝，讲席重开聚切磋。鹿洞良规期继续，云关雄势最嵯峨。学宗濂洛渊源正，地傍溪山灵秀多。更喜文翁能训士，林泉到处有弦歌。”

“鹿洞良规”指朱熹为江西白鹿洞书院所定的《白鹿洞书院教条》。在此诗尾联中，孙锵鸣把当时平阳知县汤肇熙比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办地方官办学校——文翁石室的西汉蜀郡太守文翁，非常贴切，当时瑞安那边不少学子也过江来向他请教。汤肇熙与瑞安孙衣言兄弟很投契，他在《将解官归里，留别平阳士民》10首律诗其中八中说：“眼前型典堪描画，我慕贤哉二大夫。”自注道：“瑞安孙琴西太仆与弟藁田学士均致仕家居，往来相见，丰采可仰。”

他上任翌年（1883）倡建城南龙山文明塔、南雁荡山会文书院等，现在会文书院二楼上还悬挂着其亲笔所写的“高山仰止”匾额与“理学千年，景行行止；名山一席，春风风人”楹联。汤肇熙，字绍卿，江西省万载县人，清同治癸亥（1863）进士，光绪八年（1882）任平阳知县，在任7年，政声很好，温处兵备道温忠翰赠他联曰：“政兼教养古循吏；学有根柢今通儒。”

在诗碑中，孙锵鸣这首诗后面还有一段长长的跋，其《海日楼遗集》和各种南雁荡诗选中都不录：“雁山东洞有会文书院故址，宋大观中陈贵一公兄弟讲学处也。顺溪陈君少文，公之族裔，邀集同志，重开讲塾。经始于光绪癸未之春，逾岁之成。北港一乡合捐田百数十亩，而少文为之倡，岁籍其所入以为延师课士之资，虽不甚贍，然继起者扩而充之，亦易为力。平阳之学繇此复盛，余将拭目俟之矣。右诗作于甲申花朝，己丑二月少文过予，复出此稿相示，请书上石。予嘉少文之惓惓于此，美意至无已也，不敢以诗字之拙辞。花朝后七日，止园老人孙锵鸣并记，是年七十有三。”可见这首诗作于光绪十年甲申花朝（1884年3月9日），会文书院重建于“癸未（1883）之春”。光绪十五年己丑花朝后七日（1889年3月20日），

陈少文请孙锵鸣书写，准备刻碑。

寄望平阳学风复盛

北宋大观年间，陈经邦（字贵一）兄弟从程颐、程颢学归，开理学先河的洛学由此传入平阳，因此“平阳之学”在南宋时达到鼎盛，享有“小邹鲁”的美誉，才有清代浙东学派史学大师全祖望“平阳学统始于先生兄弟”之说。孙衣言在《重修宋儒陈先生墓记》中说：“吾温既僻在海滨，平阳又下邑，而学之初兴，陈氏兄弟能与诸先生不远千里学于北方，得大儒以为依归，平阳之学由是兴焉。”平阳文化在宋代很盛，中进士的很多。民国时期学者刘绍宽在自己的日记中认为不盛，举出三条理由，也许有道理。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他在日记中写道：“余谓宋时吾平阳不为盛，何则？宋季儒学支流，虚谈性理，易于口舌标胜，一也。南渡以后，吾平正在畿内，近水楼台，科目易盛，二也。王灵仅半天下而科额不减，则登进者安得不多？三也。知此三因，则知宋时吾平不为盛矣。”当时南宋定都杭州，南方平阳“近水楼台”，宋后重新定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随着北移，形势就大不一样。在宋代，除了平阳、瑞安以及远些的黄岩，都曾有过“小

邹鲁”的美誉，整个永嘉郡有“海滨邹鲁”的称呼。何庆辅，字翰臣，瑞安人，曾在龙湖书院读书，其功课受过汤肇熙的评阅，名列前茅，光绪十一年（1885）任教于会文书院，他在别汤氏诗的诗注中说：“平邑自宋南渡，号极盛，近则去古远矣。”明清时期的“平阳之学”虽有所振兴，如明隆庆训导刘师召（楚中王门学派毛凤起弟子）向应德成等传授王阳明良知之学，清乾隆教谕卢镐（全祖望弟子）向叶嘉榆等传授浙东史学，学风士习有所改变，由于各种原因，仍然“波澜不惊”，数百年科第不振。清代，“平阳之学”渐渐陵夷，以致晚清平阳训导吴承志（俞樾高弟）在接受了知县汤肇熙的邀请，兼任龙湖书院主讲后，在《上督学瞿（鸿禴）学士》信中说：“现今开阅四课，生童肄业尚皆踊跃。每课约计呈卷二百有余，惟文理多疏，清畅之篇十不一二。其迷罔已甚者，至于触犯庙讳而不知，讹易经文而不悟。发蒙启蔽，责效殊难……即知此邦政教凌夷，文风衰替。”陈少文、周康甫（周喟父亲）重建会文书院，孙锵鸣在诗跋中寄予厚望，“平阳之学繇此复盛，余将拭目俟之矣”，汤肇熙在《劝捐平阳北港乡会文书院膏火田叙》中也说：“昔‘小邹鲁’之称，可复见已。”

在会文书院二楼，孙锵鸣还有一副楹联曰：“两雁并灵区，百廿峰中无此坛席；二程传法脉，一千载后重与讨论。”落款：“光绪癸未秋，止园老人孙锵鸣书。”癸未年就是光绪九年（1883），系会文书院重建的那年，孙锵鸣受“南雁主人”陈少文邀请，偕亲家宋宾家、女婿宋恕及恕弟仲铭游南雁荡山的翌年。陈少文，名承绂，开发南雁荡山，与开发北雁荡山的乐清蒋叔南有“南陈北蒋”之誉，人称“少文相”（瓯语方言“相”字是当时平阳人对地方有名绅士的尊称，类似“先生”）。孙锵鸣《题阊韵楼》诗题后注曰：“今予偕宋少泉及其二子燕生、中铭来信宿楼中，日则缒险凿幽，夜则倡和迭作。”宋恕《重游南雁记》文后自注说：“寒夜独坐，甚思雁荡，因追记此。甲申冬月。”正文中说：“盖余自去秋侍家君游后，志未尝一日不在雁山也。”光绪九年（1883），宋恕与瑞安学者王景羲（曾任教于诒善祠塾、温州中学堂）重游南雁。正因为孙锵鸣作了《题会文书院》诗，才引起其兄孙衣言的兴趣，次韵和了一首，才因此留下“伊洛微言持敬始；永嘉前辈读书多”这副脍炙人口的名联。

（作者单位：平阳县委党史研究室）